

分类号：

学校代码：10363

密 级：

学 号：



安徽工程大学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 _____

论 文 作 者 _____

指 导 教 师 _____

学 科（专业） _____

研 究 方 向 _____

论文提交日期： _____年____月____日

分类号：D61

单位代码：10363

密 级：公开

学 号：2221510125

题 目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研究

题 目 Research on cooperatives in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学生姓名： 郑春伟

指导教师： 李海涛 教授

专 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论文答辩日期： 2025 年 5 月 13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郑春伟

日期：2025 年 05 月 20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郑春伟

指导教师签名：

杏海涛

日期：2025 年 05 月 20 日

日期：2025 年 05 月 20 日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研究

摘 要

淮南抗日根据地处于安徽省东部和江苏省西部，东起运河，西至淮南铁路、瓦埠湖，北抵淮河，南濒长江，津浦路纵贯其间，由原皖东抗日根据地演变而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世纪 40 年代，面对日军经济封锁与自然灾害侵袭，淮南抗日根据地陷入物资匮乏与民生凋敝的困局。根据淮南抗日根据地内部的实际状况，中国共产党将长期探索的合作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村实际相结合，继承中央苏区时期合作社实践经验，逐步建立起适应战时需求的合作经济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历经初创、繁荣与尾声三个阶段。1939—1942 年，根据地政府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初步构建起合作社的组织框架。1943 年，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号召下，合作社进入快速发展期，建成涵盖手工业、消费、信用等领域的综合合作社系统，涌现出半塔民众合作社等模范典型。1946 年解放战争打响后，淮南地区的军政系统逐步北上，群众性的合作组织暂时停办。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既包括传统合股经营，又创新推行“劳力折股”“实物入股”等灵活机制，有效激活了农村分散的

生产要素。在工资、分红、工厂与工人管理等方面，合作社也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制度模式。面对资金短缺等困境，根据地政府通过加强政策倾斜、提供金融补助等措施，为合作社发展提供制度性支持。在内外制度日益健全的同时，合作社又通过开展工人思想检讨会、整顿干部作风等措施保障自身健康发展。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在平抑物价与赈济灾荒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改善了根据地民众的生活。合作社也充分发挥商业属性，在商品生产流通及金融等经济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同时，根据地的合作社超出了单纯经济事物的范畴，深度融入根据地基层组织的建设，实现了经济价值与组织价值的统一。因此，回顾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其经验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农村合作社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淮南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合作社；组织管理

RESEARCH ON COOPERATIVES IN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ABSTRACT

The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was loc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Anhui Province and the western part of Jiangsu Province. It stretched from the Grand Canal in the east to the Huainan Railway and Wabu Lake in the west from the Huai River in the north to the Yangtze River in the south with the Jinpu Railway running through it. It evolved from the original Anti-Japanese Base Area in eastern Anhui and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emy rear base area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Central China.

In the 1940s facing the economic blockade by the Japanese army and the invasion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Huainan Base Area fell into a situation of material shortage and economic declin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bined the long-term explored cooperative economic theory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rural China inherite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cooperativ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nd in light of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cooperative economic system that met the needs of the wa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operatives in the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initial establishment prosperity and decline. From 1939 to 1942 the base area government through the launch of the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movement initially established the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of the cooperatives. In 1943, under the cal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in Huainan, cooperatives entered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forming a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system covering areas such as handicrafts, consumption and credit, and giving rise to model examples like the Ban Ta People's Cooperative.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Liberation War in 1946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the Huainan region gradually moved northward and the mas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were temporarily suspended.

The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the cooperatives in the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included traditional joint-stock operations as well as innovative flexible mechanisms such as "labor shareholding" and "physical shareholding" effectively mobilizing the scattered production factors in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wages dividends factory and worker management the cooperatives also explored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models.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such as capital shortages the base area government provid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ves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olicy inclination and providing financial subsidies. While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stems

were increasingly complete the cooperatives also ensured their healthy development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holding workers' ideological review meetings and rectifying the style of cadres.

The cooperatives in the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played a prominent role in stabilizing prices and providing relief during disasters, improving the lives of the local people. They also fully utilized their commercial attributes, making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s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as well as finance, effectively support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peratives in the base area went beyond the scope of simple economic affairs and were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e base area, achieving the unity of economic value and organizational value. 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operatives in the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heir experience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operatives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eng ChunWei (Study 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upervised by Li Haitao

KEY WORDS: The Huain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operation; cooperative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成立的基础条件	9
第一节 理论基础	9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合作社理论的阐释	9
二、 中国共产党人对合作社理论的早期认识	13
第二节 实践基础	15
一、 中国共产党领办合作社的早期实践与经验积累	15
二、 淮南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实际形势	16
第二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18
第一节 合作社起步时期（1939-1942）	18
一、 农业互助组初步发展	18
二、 各级合作社初步组建	19
第二节 合作社繁荣发展时期（1943-1945）	20
一、 农业互助组广泛开展	21
二、 各类合作社不断壮大	22
三、 繁荣发展中的模范	24
第三节 合作社停办时期	26
第三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管理	28
第一节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类型	28
一、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28
二、 消费合作社	32
三、 信用合作社	33
四、 其他类型的合作社	35
第二节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实践困境	36
一、 部分合作社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	36
二、 政府扶持力度有限	37
三、 合作社制度尚待完善	38

四、社员与干部的意识有待提高	39
第三节 淮南根据地合作社困境的应对措施	40
一、坚持群众路线	40
二、提高政府扶持力度	41
三、完善合作社内部财政制度	44
四、开展社内教育	48
第四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历史贡献	51
第一节 改善人民生活	51
一、平抑物价	51
二、平糶赈贷	52
第二节 推动经济发展	54
一、充裕物资	54
二、统制商品	55
三、辅助金融	56
第三节 助推基层社会秩序调整	57
第四节 为解放后合作组织的重建提供经验	58
第五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当代启示	60
第一节 坚持党对合作社工作的领导	60
第二节 以“典型示范”增强农民办社的内驱动力	62
第三节 重视综合发展的办社方向	63
第四节 坚持实事求是的办社原则	65
结 语	67
参考文献	68
致 谢	73

绪 论

一、 研究意义

合作社是近代产业工人争取劳动者权益的产物，在传入中国后得到广泛普及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后，中国合作社事业随之拾级而上。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主要围绕工人阶级组织消费合作社。1922年7月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合作社事业的起点。^①土地革命时期，随着农民运动的不断深入，合作社因其组织效用突出，进而其重视程度不断被提高。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合作社的实践样态更为丰富，组织理论和发展章程愈加规范。合作社的发展有效地改善了根据地的民生、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回顾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历史，解析其中经验，依然具有一定历史价值。

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强国的背景下，合作社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仍是一种有益补充。进入新世纪以来，“合作社”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出现的频次不断提高。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此文件的通过是我国百年合作社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针对农村发展的新情况，提出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措施，为农村合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窗口。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强调要发展农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并提出要发展“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村合作体系。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调研再次强调，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在2022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销社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是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202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成立7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供销合作社要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

^①文侃.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的典范——论中共安源支部的历史地位与贡献[J].苏区研究,2022,(05):18-33.

农业强国作出更大贡献。综上所述,发掘并评析 20 世纪上半叶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历史,对于指导当今的合作社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一) 国内研究现状

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事业是根据地建立、巩固、发展过程中绕不开的议题,合作社犹如一面历史透镜,折射出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正是因为其重要性价值,学界关于合作社的研究内容丰富、角度繁多、史料浩繁。现有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以下类别:

1. 有关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合作社的总论性研究

互助合作运动是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事业的先导。抗战时期,中共及边区政府秉持积极领导方针,倡导群众组建互助组织,开展劳动互助。各根据地由此开展了规模不等的互助合作运动,构建起互助组、劳动互助社以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层级结构。诸多学者以该历程为视角进行了相关研究,如俞小和从互助合作运动出发,结合社会学的角度,指出了合作社与互助组在组织和业务上的广泛联系,表明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中合作社的阶级性以及在扶助贫农方面的重要作用。^①贺金林考察了变工互助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兴起,并分析了变工互助运动组织形式向合作社方向演变的历史动因。^②吴云峰剖析了淮南、淮北、盐阜、淮海等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就互助合作运动中合作社的组织原则、具体形式进行了细致的阐述。^③钱斌与马红伟围绕太行、太岳根据地的互助合作实践,再次申明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典型引领、劳武结合等典型组织原则的实践效用,以及互助合作运动在克服根据地劳畜力短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善群众生活等问题中的显著效果。^④

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架构直接关系根据地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创设出合乎乡村实际的政权架构,同时又从古代的乡村自治

①俞小和.调整与变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J].安徽史学,2013,(04):110-117.

②贺金林.抗日根据地的变工互助运动[J].党的文献,2018,(02):91-98.

③吴云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研究[J].中国农史,2021,40(01):132-145.

④钱斌,马红伟.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J].农业考古,2024,(04):54-62.

传统中汲取经验，实现了部分的文化复归。贺文乐指出，合作社是中国共产党构建农村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是“组织起来”的现实形式，是农村基层组织的实践样态。^①吴路伟认为，合作社是稳定农村社会基本秩序，是构建农民动员机制的重要因素。^②张宏华指出，根据地乡村的社会改造与建设是中共领导的革命中的改革，合作社在其中承担着突破外来新文化与乡土传统文明之间的隔膜的作用，并对乡村民生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③宋利考察了晋西北根据地，提出合作社是激发民众参与抗战的经济动因，且承担了农业生产知识和技能传播的组织载体的功能。^④

直接对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加以考察的有：何伟福论述了合作社在物资统制、工农生产、赈济灾荒、团结群众等问题上的突出作用。^⑤贺文乐叙述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革命化转型，从中透视出中国共产党借此整合乡村社会各类资源，以及建立乡村社会合法性权威的双重革命目的。^⑥苑朋欣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改变了农村的经济模式，改善了生产关系，带动了根据地生产力的提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⑦

此外，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合作社事业的史料论著也颇为丰富。1981年，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与陕西省档案馆合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政策，其中也包含有对该时期合作社政策以及边区合作社发展的相关介绍。1983年，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对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发展做了系统的整理，为本研究的横向拓展打开了思路。1990年，杨德寿主编的《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详细辑录了土地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社政策、合作社组织情况及地方模范社的实践样态，为本研究的纵向分析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借鉴。

①贺文乐.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03):96-102.

②吴路伟.农民动员机制构建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治理[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01):64-76+141-142.

③张宏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山西大学,2019.

④宋利.抗战时期中共乡村动员机制研究[D].内蒙古大学,2023.

⑤何伟福.抗日根据地合作社述论[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8):17752-17756.

⑥贺文乐.革命与合作: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1937~1945)[J].农业考古,2020,(03):91-97.

⑦苑朋欣.在曲折中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J].农业考古,2023,(06):152-160.

2. 有关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专题性研究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华中领导建立的第一块大面积根据地，其政治、经济、文化经历了较为系统的建设过程，在华中各根据地中工作开展较早，发展周期较为完整。学界已有不少学者围绕此根据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房列曙沿着江靖宇参与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史脉络，系统阐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概况。^①张玫与郑金彪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党风廉政建设经验进行了细致梳理与深入阐释。^②赵道旭以文艺史为研究视角，指出文艺建设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在纷繁复杂的局势下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根据地的革命文化也丰富了该地区的文艺实践样态。^③

此外，与淮南抗日根据地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内容丰富，从各方各面勾勒出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历史概况。1983年出版，由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编写的《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共三辑），涵盖安徽省境内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生等方面的众多史料。其中与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的财政政策、社会民生、合作社概况相关的史料，为本研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材料支撑。1987年，由《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写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辑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境内与军事斗争、财政贸易、教育工作相关的资料，是研究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实践的重要参考。1986年，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江苏省财政厅编写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1982年出版，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写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以及2005年，由上海市新四军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写的《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等文献材料，都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史资料支撑。

1991年出版，龚意农主编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一书论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经济的概貌，对半塔民众合作社等模范社也做了简要介绍。2004年出版的由章书范主编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货币史》，总结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①房列曙.江靖宇与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以来(安)六(合)地区为中心[J].军事历史研究,2018,32(05):1-17.

②张玫,郑金彪.淮南抗日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研究[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04):68-77.

③赵道旭,冯翠.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建设及其成效[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03):31-38.

的财政系统发展概况，亦对根据地合作社进行了相关论述。房列曙的著作《安徽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概况。

地方史志、近代报刊为本研究提供了颇具信度的历史材料。在史志方面，严希总纂，安徽省来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来安县志》于1990年出版，其中第四章、第三十二章含有关于半塔民众合作社等模范社以及主要创办人物的相关记载。1997年，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安徽省志 41 供销合作社志》也对淮南地区的合作社进行了详细的辑录。此外《解放日报》《新路东》《路东通讯》《淮南党刊》《淮南日报》等近代报刊都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历史资料。

（二）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以大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进行了扼要的叙述，其中就曾提到中央苏区时期的合作社运动。^①马克·塞尔登在其开创性著作《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以陕甘宁边区为研究样本，通过系统性考察中共根据地的战时实践，构建了关于1920年代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进程的阐释框架。作者提出的“延安模式”理论体系，将中共革命的成功归因于多维度的制度创新，其中延安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正构成该模式在经济领域的关键实践。塞尔登着重指出，这种将传统农村互助习惯制度化的经济组织方式，不仅推动了农业生产关系的革新，更通过重构基层社会经济网络，实现了政治动员与社会治理的深度结合，为革命政权的巩固提供了双重支撑。^②达格芬·嘉图在《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一书中集中论述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合作劳动的必要性和作用、互助劳动的活动范围和形式、劳动互助的组织和参加人员比例、互助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互助合作中的矛盾和问题。^③弗里曼等人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

①[美]费正清；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②[美]马克·塞尔登;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③[瑞典]达格芬·嘉图;杨建立等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面对新产生的社会主义。^①以上研究为观察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与组织管理提供了不同视角，拓展了本课题的学术视野。

其他与抗日战争时期合作社相关的国外研究包括：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在其经典研究《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通过对华北、华东地区典型合作社进行分析，系统阐释了新中国初期供销合作社网络的社会重构功能。其跨区域比较研究揭示，这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不仅重塑了基层权力结构，而且激活了区域间的市场流通。^②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建构了更具理论张力的分析框架，指出供销合作社实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枢纽。通过翔实的数据论证，罗兹曼阐释了该组织的双重历史作用：一方面将农业剩余定向输送至工业部门，积累了初期工业化的原始资本；另一方面通过配置基础资源，构建起覆盖全国的统分结合网络。这种双重作用的组织架构至今仍在中国乡村治理体系与集体经济模式中持续显现。^③

基于上述研究可见，国内外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合作社的研究虽然著述颇多，但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社的具体研究较少。而缺少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便难以全面地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合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间的互构路径。基于此，本文开展了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宏微观相结合的评析，并期望能充实相关研究。

三、研究重难点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回顾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事业的总体进程，二是总结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历史经验，三是发掘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启示。

本课题的研究难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将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事业置于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合作社事业的整体进程中进行把握。

二是发掘史料与整理文献档案方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合作社实践在发展上有着较长的追溯区间，其中涉及诸多合作社思想与理论，需要系统把握梳

①[美]弗里曼等;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②[美]施坚雅;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③[美]吉尔伯特·罗兹曼;“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理。党中央和根据地政府对合作社的发展也有着较多相关政策，都需要从文献史料中逐步发掘。

三是如何从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历史经验中提取出对当今合作社发展的启示。鉴古方能察今，当今农业合作社与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在经营机制方面有一定共性，但要探讨其经验如何作用于当今农业合作社发展，还需置于当代合作社发展的现实背景中进行考量。

四、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本课题的创新之处主要集中在史料的选用、研究视角的转变以及研究观点的拓展上。在史料选用方面，本文的征引文献包括史料汇编、文集、文选、自传、回忆录、地方志、文史资料以及抗战时期的报纸杂志等。此外，安徽省图书馆、来安县档案馆的馆藏文献中，也含有与抗日战争时期淮南抗日根据地农业互助所相关的史料，对于考察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农业互助的概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研究视角的转变上，学界对抗战时期合作社的考察多以互助合作运动的视角，将合作社作为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补充例证进行说明论述；或以根据地经济史的视角，将合作社置于根据地经济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抑或从根据地的农业发展对合作社展开相关探讨。本课题主要基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整体实践与个体经验，结合根据地实际情况与相关政策，通过横向上的根据地合作社的对比，以及纵向上的与淮南抗日根据地境内诸多经济组织的联系，分析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而对抗战时期合作经济的总体研究添砖加瓦。

在观点拓展问题上，学界关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宏观的经营层面，对合作社的作风问题关注较少。合作社作为经济属性明显的组织，其经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作风问题。同时，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组织的基层实践正值党的整风运动时期，根据地内相关干部的作风意识在此时期都有较为明显的变化，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总结。

本课题的不足之处：囿于笔者在学术视野、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局限，对合作社的运行机制的阐述存在一定不足。在史料上，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合作社发展的史料卷帙浩繁，笔者对相关的档案文献的查找仍有疏漏。在研究

范围上，本课题研究下的合作社与其他根据地的合作社的对比性分析较少。在研究深度上，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是动态的过程，前一个发展阶段与后续发展阶段之间在政策演进、组织更替等方面应有系统阐述，但受文史资料所限，本文展开深度有限。

第一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成立的基础条件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的支撑。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合作社作出了科学的理论阐释，而早期中共领导人结合中国实际，也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发展与群众动员为核心的合作社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合作社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抗战时期淮南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展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一节 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合作社理论的阐释

（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合作社理论的初步阐释

在十九世纪中叶欧洲革命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的洗礼下，马克思、恩格斯逐渐关注到合作社对工人阶级的联合性作用，以及对农民阶级的关照性力量，并鞭辟入里地开展了一系列剖析，详见于《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法兰西内战》《法德农民问题》等经典文献中。对于合作社的作用，马克思首先预见了合作社在工农同盟问题上的巨大潜力，他认为合作社是吸引农民参加工农联盟的重要方式。马克思认为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重要的同盟军，若没有工农联盟的支撑，无产阶级“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①但受制于小农生产模式的保守性，农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难以冲出小生产者思想的窠臼。虽然小农的阶级利益是同一的，“但是这种同一性并没有使小农形成某种政治的、经济的联系或建立某种政治的、经济的组织。”^②小农既缺乏革命的思想，又难以形成革命的组织。对此，马克思总结道：“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队伍”^③。因此，只有与工人阶级建立广泛的联盟，小农才能争取自身阶级的利益。1894年，恩格斯在《法德农民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4.

②蒋淑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迪——基于经典文本的考量[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03):12-24.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

问题》中也再次申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①，他在《1847年的运动》中预言：“总有一天贫困破产的农民会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②因此，合作社是无产阶级联系农民阶级的可靠纽带，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把小农的分散的生产要素整合起来，把小农组织起来，以联合的生产代替孤立的生产。根据马克思及恩格斯的重要论述，无产阶级肩负着对小农进行教育改造的任务，只有把小农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才能突破固有思想的束缚，激发历史自觉，充分调动他们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其次，马克思预言了合作社是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马克思通过合作工厂观察到，生产并非要全部依赖于雇主阶级，雇佣劳动作为低级的劳动形式必定要让位于联合劳动，合作社在此种意义上就是旧形式内的第一个缺口。他进一步预言道，如果可以借助合作社的组织方式来终结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缺陷，那“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③恩格斯指出，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农业，才能利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才具备向下一阶段转型的劳动资料。^④他进一步肯定道：“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⑤合作社具备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又同时拥有经济效能和组织效能，“它不仅作为一个平台，让小农户摆脱贫乏的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工具手段，是一种能够实现小农户与农业生产有机衔接的重要方法”^⑥，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

最后，马克思洞见了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认为合作社既是对资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4.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11.

③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4.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1.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5.

⑥任大鹏,赵鑫.马恩的合作社思想与当代合作社价值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04):13-20.

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否定，又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可以接受和实行的。^①合作社并不孕育有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就其本质而言，是生产关系领域内的变革，尚不能撼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合作劳动无论它在组织原则上如何优越、实践效能如何显著，只要它仍是局限于个别劳动者的偶发性实践，“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②而这种群众偶发创造的、狭小的组织形式，也绝无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之可能。^③只有在无产阶级主导的大前提下，合作社才具备社会变革的力量。而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合作社缺少统筹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甚至有滑入剥削阶级的趋势。马克思对此指出：“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④因此，只有革命的阶级取得革命的政权，以全面的联合代替偶然的联合，才能将合作社这一变革性力量落于现实的土壤。

（二）列宁对合作社理论的深化

对于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列宁认为合作社是改造俄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路径。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明了俄国公社的特殊历史意义，分析了这一有别于资本主义下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特殊生产方式，指出“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⑤公社的存在让俄国于理论上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在现实中仍受到落后社会环境的困囿。俄国十月革命后，政权更迭，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于夭折，但也为俄国社会留下了创痕。列宁站在旧有俄国社会与苏维埃政权的交汇点上，寻找弥合农民

①周万钧.合作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73.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06.

③马克思.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8-219.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12.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0.

与国家、个体与集体利益矛盾的解决方法，最终促成了对合作社的重新审视。在经济层面，农民阶级占据俄国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农民阶级的合作化就意味着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稳固。而且，大生产类型农业的充分发展，能充分运用起工业革命以来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制度层面上，合作社在不违背生产资料国有的原则上，能让农民有更高的接受度以降低转型中的制度摩擦。在实践层面上，在动员农民参加合作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自愿、示范和帮助的原则。占有领导地位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耕作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将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到合作化的阵线上。^①也只有循序渐进地带领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才能充实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维持社会稳定发展。

对于合作社的组织问题，列宁始终强调农民文化改造的先决性。针对苏维埃俄国农民文化落后的现实，他于 1923 年指出：“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②这一论断在经济层面上将合作社工作与文化工作统一起来，确立了文化工作推动基层组织工作的实践逻辑。为此，列宁提出必须实现居民“人人识字”“有足够的见识”“会读书看报”等具体标准，并断言：“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③列宁提出的这一命题既是基于俄国社会文化环境的现实考量，又是对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深入阐发。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阐明其终极目标：“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脚跟。”^④由此可见，列宁的合作化理论框架中，在农村开展文化革命既是通往合作化的基本途径，又是以合作化推动社会主义政权稳定过渡的内在条件。

在关于合作社类型和重要性问题的阐述上，马克思将合作社运动置于生产关系的改造维度，强调生产领域的劳动联合对消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作用。列宁则在继承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作出相应延展，通过对苏维埃初期社会经济结构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 3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0.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 4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7.

③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 4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68.

的分析,揭示出消费合作社在商品流通环节实现集体化的特殊效能——这种流通领域的协作形式既符合小农“贱买贵卖”的微观行为逻辑,又能潜移默化地培育小农的集体主义意识。此外,这种以商品的流通带动观念的普及的实践路径,本质上是将农民的生存本能转化为社会改造动能。当小农的家庭经营单元在市场化过程中遭遇结构性矛盾时,预先建立的商品领域的合作化便成为推动生产领域合作化的历史中介。列宁对消费合作社的重视与第二国际时期盛行一时的合作社社会主义理论有一定相似之处,但列宁所构想的由消费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径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占有领导权的社会条件下的历史推演,并非合作社社会主义这一委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改良方案。列宁认为消费合作社为新经济政策下苏维埃俄国的社会转型铺就了道路,他阐述道,“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①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合作社理论的早期认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及大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渗透与殖民掠夺严重破坏了传统农业经济与手工业体系,加剧了工农群体的生存困境。在外国资本与军阀政权双重压迫下,中国工人每日劳动 12 小时以上仍无法温饱,农民因高额田租、苛捐杂税陷入赤贫的残酷困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合作社视为组织工农群众、推动社会革命的重要工具。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指出:合作社是“劳动运动中最要紧的工作,是在经济利益之下团结工人、引导工人从事经济斗争的一种方式”。^②这一论断揭示了合作社在革命语境下的双重属性——既是对抗剥削的经济组织形式,也是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政治载体。

针对农民这一“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中共早期领导人尤其注重合作社与农民的联动。陈独秀指出了建立农民协会的可能,他在《中国农民问题》中提出:“小农中国之农民,他们各阶级间无明显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组织。”^③而借由这一阶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 4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8.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 5 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5.

③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30.

级上的联系便可开展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斗争。但仅依靠农民协会这一组织形式还不足以解决农村严峻的经济问题。张太雷指出：农村经济因劣绅土豪之封锁，贫者无处借贷，金融停滞，“所以我们一定想一种新的乡村金融方法，农民银行的设立及合作社之推行，是目前绝对必要的。”^①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合作社的理解是随着农村革命的动态变化而不断深入的。

毛泽东早年受俄国民粹主义、日本新村主义及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影响，尝试通过合作社形式探索社会改造。1919年，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中提出农民自发联合的必要性。^②他设想通过“新村”实验构建理想社会，如建立公共农场、消费社等，将家庭、学校与社会结合为“新社会”单元。1920年，长沙“大同合作社”和“合作期成社”的成立，旨在通过“工读互助”和合作经济实现平等，虽未持久，但反映了早期对合作社作为反剥削工具的初步认识。1925年至1927年，毛泽东写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关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合作社的发展应有详细的组织章程，并重视其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唯有如此才能使得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③随着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毛泽东对合作社的认识也更为深入。1933年11月他在《才溪乡调查》中介绍了才溪乡农民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组织各类合作社的情况，为后来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打下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合作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理论支柱。毛泽东反对强制合作化，强调合作社必须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他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指出：“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绝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④同时，毛泽东预见了合作社蕴含的组织力量。他在《论合作社》中分析：“如果全体人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么现有全陕甘宁区的生产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以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⑤合作社所带来的组织力量，作用

①张太雷.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92.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342-343.

③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2.

⑤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M].邢台:冀南书店,1946:50.

于生产力的大幅提高，进而带动生产关系、生产制度的革新，依毛泽东所说，这是“第二个革命”。^①

第二节 实践基础

一、 中国共产党领办合作社的早期实践与经验积累

中国共产党早期合作社实践始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抗争。1922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发起中国首个无产阶级政党主导的工人消费合作社，通过集体采购低价供应米、盐、布等必需品，影响了安源地区的万余工人群众。这一实践不仅直接打破中间商对工人的剥削，更开创了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阶级动员模式，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斗争的里程碑。随着农民运动兴起，合作社理论开始向农村渗透。1926—1927年，毛泽东在广州、武汉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特聘中国合作运动先驱于树德讲授《农村合作概论》，系统引入信用、生产、消费合作社理论，培养出首批兼具革命意识与合作经济知识的农运骨干，为合作社思想从工人运动向农村革命的战略延伸打下了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合作社运动已形成规模化实践。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略史》记载，至1933年9月，苏区已建立消费合作社900多个，社员超20万人，股金达28万元（苏区货币）。^②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强调：“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第一位”，通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粮食合作社平抑粮价，实现“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的双重保障”。1933年，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合作社总数达1923个，股金30余万元，形成覆盖生产、流通、信贷的网络体系。^③这些合作社低价供给农民必需品，高价收购粮食，既打破经济封锁，又使工农联盟在经济战线上得到巩固。

抗日战争时期，合作社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较大跃升，尤以陕甘宁边区的合作社发展最为瞩目。1939年，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合作社决议》，确立“民办公助”原则。典型如延安南区合作社，

①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M].邢台:冀南书店,1946:50.

②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市中心支行课题组,黄晖,杨晖.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的实践及启示[J].银行家,2023,(10):124-126.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3.

整合消费、生产、运输、信用四大功能，被毛泽东誉为“真正被群众拥护的合作社模范”。至1944年，陕甘宁边区合作社达634个，社员26万人，股金7亿边币，形成“村村有社、户户入股”的格局。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实际形势

淮南抗日根据地位于江淮地区中部、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两侧，由津浦路东、路西两块根据地构成。抗日战争爆发前，淮南地区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虽然津浦铁路贯穿其间，交通便利，但也因此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严重，民族工业及手工业发展滞缓，生产力水平低下。除帝国主义经济上的盘剥外，封建主义的桎梏也极大地封锁着人民的生产热情，土地集中、重租高利、苛捐杂税在淮南地区俯拾即是，而作为该地区主要经济成分的农业“一般还用着中世纪的犁耙与人工灌溉”^①，近似于火耨刀耕的状态。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对淮南地区的农业生产状态评价道：“皖属土地集中大地主手中（土地多至万石者），地租重（对分），利息高（五分、十分），捐税多，农村破产厉害，生产力惊人低落；苏属土地比较不集中，自耕农数量相当大，但捐税重，利息高，因此贫农民众占多数，生产力降低。”^②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亟待新的组织形式以整合发展。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的实践证明了互助合作这一组织形式在根据地的泛用性及实用性。这种劳动形式不仅能保障农时，合理调配人力畜力资源，还显著提升了耕作效率与群众协作意识。^③类似的组织经验在淮南地区的传统劳作中也早已有之，当地长期存在“扯工”“换工”等劳动力调剂方式，尽管其运作范围限于亲友邻里的小型圈层，但因其符合农村社会关系结构，既维持了生产效率，又延续了地域耕作传统。这种基于农村熟人社会的互助模式为后续有组织的合作化运动提供了本土基础。

1938年春，新四军在淮南地区开展斗争后，即刻着手于减轻群众负担，废除苛捐杂税，取缔带有封建垄断性质的“牙行”和影响生产的“义务工”等陋俗，

①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29.

②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张云逸军事文选[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186.

③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490.

从侧面推动了根据地的移风易俗，为互助合作运动扫清了道路。此后，淮南区党委书记刘顺元根据党中央对互助合作的相关论述，结合当地民众有互相换工的传统，指示半塔中心区委组织引导民众开展劳动互助运动，建起了若干个劳动互助小组。在新四军与根据地政府的协力作用下，淮南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逐渐开展起来，合作事业的发展也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第二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事业是在敌伪环伺、灾荒频发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这期间，从党中央到淮南区党委，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事业的发展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召开各类会议讨论合作社发展事宜，出台引导合作社发展的文件。在党中央及淮南区党委的领导下，根据地的合作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合作社起步时期（1939-1942）

淮南地区地处战略要冲，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1938年5月22日徐州会战失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迅即发布《关于徐州失守后对华中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长江局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江北地带建立独立工委，核心使命是“发展游击战争”。^①在此战略部署下，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于同年8月正式成立。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于1939年4月24日发布《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中原局据此将中共皖东工委改为中共苏皖省委，构建起包含路东工委（辖来六滁边区县委等）、3个中心县委、5个县委及多个工委、区委的组织体系。^[注1]随着根据地党政机关的逐步建立，根据地的合作社事业随之铺展。

一、 农业互助组初步发展

1938年后，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央提出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1939年2月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②淮南地区的党政机关初步建立后，即着手解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114.

② 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0.

注1:路东工委下辖来(安)六(合)滁(县)边区县委、天长工委、盱(眙)嘉(山)工委。除中共津浦路东工委外，中共苏皖省委还先后下辖定(远)凤(阳)、合肥、和(县)江(浦)3个中心县委，和(县)含(山)全(椒)、巢县、全椒、寿县、藕塘中心区5个县委，合肥、天长、定(远)凤(阳)3个工委，周家岗、珠龙桥2个区委。

放民权、发展民生，而采取的策略便是减租减息，削减赋税。

1939年津浦路东办事处颁布了《解决当田纠纷条例》，确定无偿退还当田以及打折赎还等办法，促进了根据地生产关系的变化。^①1940年，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推广实行“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借粮还粮”“借钱还钱”等办法，并取消各种落后的租佃习俗，如看租酒、租草等，缓和了租佃矛盾。在捐税方面，根据地政府相继废除了抗战前的各种苛捐杂税，“溯1940年路东联防办事处成立以来，共取消了十三种杂捐杂税，如保甲经费、户口捐、牛头捐、营业税、印花税、牲畜税等，削弱了封建剥削。”^②随着减租减息与削减赋税工作的开展，大量劳动人口经济负担减轻，田间杂役的压力减小。同时，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积极作为，打出“劳动神圣”的口号，号召全体人民来参加生产运动，并组织军队指战员及全体行政人员来帮助老百姓生产，地方行政人员亦积极参加。^③一系列的政策增强了党在乡间的组织力，促进了农业互助组的发展。

二、 各级合作社初步组建

1940年，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颁布《合作社组织大纲》，指示各地民主政府帮助建立合作社。直属区率先创办了汉涧合作社，社员可购得便宜货物，岁末年初还能分得红利。路东联防办事处下属的天长、高邮、盱眙、来安、嘉山等县，也于同年9月，在当地工抗会、农抗会和妇抗会等群众组织的支持下创办了消费、生产、信用三种类型的合作社。但此时农村尚未完全脱离封建式的生产关系，经济仍然较为封闭，合作社也还未具规模，多是作为商品调剂之用。

1941年1月14日，在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参议会上，邓子恢指出，“为了打破敌人封锁，内部农工业品产销之调剂，流散资金之利用，民众买卖之便利，并与商业资本之垄断居奇作斗争，发展合作运动是非常重要的。”^③此时，根据地内的公办合作社已有较大发展，各县区大都配有公营合作社以统筹公营商业，但群众组织的合作社数量相对较少，股金规模还需拓展。对此，邓子恢规划了根据地

①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183.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184.

③中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供销合作史料选编(第二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427.

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指出:“以后合作社应逐渐扩大营业,不但开商店,而且应该办借贷所,开抗日饭,并大量扩大股金,入股者不必限制,以便集中流散资金,大大发展合作事业。”^①在合作社扩股的呼声中,参议会通过了《鼓励以大量资金参加合作社》的决议,根据地内的合作社开始向地主和商人集股。在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下,群众的组织性被充分调动,群众的集体意识和合作意识随之萌动。

1941年至1942年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1941年夏,日军以5000余人进犯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又于1942年春,对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国民党李品仙部乘机配合日军向路西根据地进攻,一度侵占中心区藕塘镇,残杀抗日军民。1942年,根据地还遭受严重旱灾,灾民达20万人之多。至1942年底,淮南抗日根据地面积比1940年8月缩小了二分之一,人口不足100万,财源锐减、财政困难。^②天灾与敌袭让根据地的各项事业遭受严重打击,但群众的合作意识已然产生,群众筹办合作社以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趋势不可避免,据津浦路东根据地《新路东》报记载:

来安县第三区施营附近一带,有世居于该地王姓者,计三十七家,蓄有公共田产十二担,奈坐落今之敌占区域——来安城西八里以内地方,每载均无法执业敢租,同生遗恨。三四年余,竟无良策以济。最近,并由王姓派出代表四人,顶名合法出售。最近短期内,售价为四万六千元。闻王姓等拟按全姓户数平均分配。本月四日曾于某庄聚会,有愿结股开办合作社,响应政府号召,以增加敌后生产。^③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的组织号召下,根据地人民对发展经济以驱逐外夷的决心不断增强,合作社也承载了根据地群众富民强兵的寄托。随着天灾兵燹的暂时褪去,根据地的政权组织结构愈发稳定,商业经济逐渐回暖。合作社充裕经济,发展生产的作用也愈发显著。

第二节 合作社繁荣发展时期(1943-1945)

1943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关于精兵简政和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指示,根据地成立了淮南区党委,下辖津浦路东、路西两个地委。撤销津浦

①中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供销合作史料选编(第二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427.

②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49.

③来安施营王姓捐献祖产救国[N].新路东报,第176期,1942-09(1).

路东地区的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和路西联防办事处，统一成立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下辖路东、路西两个专员公署。随着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有了坚强的统一的领导核心，根据地的合作社事业也开启了繁荣发展的阶段。

一、 农业互助组广泛开展

1942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①为响应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各地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开展，成为仅次于减租减息的又一个大规模群众性运动。农业是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产业，根据地政府抗战前期经费的重要来源即是田赋。因此，农业互助组的广泛铺展与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1943年，华中局把发展生产作为群众运动和改善民生工作的中心，强调互助合作就是为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服务的。华中局在《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中提出：“要研究和提倡当地群众习惯中所存在的各种劳动互助的形式（如延安的变工，淮南的扯伙和换工），以组织劳动互助运动和提高其劳动效能。”^②1943年5月，华中局号召华中各地将农业工作集中到合作组织的建立上，提议“在那些尚未进行减租减息（或进行不彻底）的地区应继续进行和贯彻减租减息运动，在那些新开辟地区应抓住减租减息的口号开展群众运动，确立群众运动的基础。在那些一般已经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地区主要应把发展生产提高为合作运动。”^③在华中局的组织领导下，各根据地的农业互助运动随之高涨。

1943年秋，淮南区党委加强了对开展互助合作的号召，要求各县政府部门深入基层加强对农业互助的领导。1943年5月新铺会议后，淮南区党委根据上级的指示，面向群众，加强了对乡村的调查研究工作。刘顺元、方毅、张劲夫、李世农等淮南区主要负责人，率38名干部组建4个调查组，对发乡、安乐乡、七贤乡及桑园乡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并形成了《安乐乡调查》《安乐殿发两乡乡选经过的调查》《东庙区七贤乡的让息争》《对乡村雇工工作的几点意见》等调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91.

②江苏省财政厅等.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6-17.

③江苏省财政厅等.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4.

查报告。^①这批调查报告既完整记录了租佃关系、雇佣形态等经济数据，又深入剖析民主政权建立过程中各阶级的真实反应，为制定符合乡土社会实际的互助合作政策提供了详实的乡村经济图谱。在根据地政府的多方组织下，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农业互助发展迅速，路东地区尤为显著。1943年，路东中心区的来六县“已有4900多个农户，在当地工作干部及知识分子帮助下，订出了一年生产计划。”^②1943年冬，“全县又利用冬闲组织了各村生产委员会及242个劳动互助组，36个纺织小组，劳动力互助，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40%以上。”^③至1944年年底，来六县已组织起互助小组3909个，平均全县已有67%的群众组织起来。互助合作运动的浪潮也不断从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向外扩散。1944年秋，路东的天高县共组织全劳动力68693人，半劳动力26150人，合计为94843个劳动力。^④如果全县以30万人口计算，除南湖北湖两个地区的渔民，铜城市与大小集镇市民共约5万人以外，已组织的劳动力占全县人口的40%，马坝区已组织全体劳动力的83%，大通、黎城区也超过70%以上，已初步形成集体劳动生产的趋势。^⑤至1944年午收，整个路东地区已组织起8000个互助组，参加互助的劳力达10万个以上，农业互助组已深度融入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生活。^⑥农业互助组的广泛开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据《解放日报》所载，淮南来安泉水乡在1944年“增产粮食二千余石，增产棉花三万一千斤，纺纱换布所得，每户亦能平均得布二十三斤半”。^⑦

二、 各类合作社不断壮大

从1943年开始，合作社由此前“自上而下”的公营商业性组织逐渐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组织。群众自发集股成立的合作社规模超过了公营合作社，且广泛地涉足商业领域。津浦路西根据地内，“较大的集镇像藕塘、池河等都设有民生商店，民营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商行等遍布根据地各乡镇”。^⑧根据地

①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淮南抗日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118.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280.

③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70.

④刘顺元.路东各县七一生产会议的总结[J].淮南党刊,1944,(17):01.

⑤淮南来安泉水乡开展劳动竞赛[N].解放日报,1944-04-19(1).

⑥章书范.淮南抗日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65.

政府还将合作社与农村副业相结合，提议“如近山的乡，就举办‘畜牧生产’或‘种棉生产’；近水的乡就举办‘鱼藕生产’等合作社。并发动竞赛，引起他们对生产的兴趣，造成生产热潮，用各种各样方式奖励他们。”^①

在政府的倡导下，各类合作社纷纷涌现。市坊大多设有消费合作社，但更多的是各种生产合作社，如榨油、农具、卷烟等合作社。这一时期由于根据地布料的短缺，纺织合作社迎来了较大的发展。1942 年底，日伪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布匹封锁，粮贱布贵，洋布 25 元一尺，比 1937 年上涨了 300 倍以上。^②为解决根据地人民穿衣问题，民主政府号召群众植棉，并组织建立纺织合作社与民众纺织厂。截至 1944 年，参加纺织合作社的有 5880 名社员。^③

部队和政府机关的合作社事业也取得了显著成果。1943 年，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号召：“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④他希望前线各地，“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⑤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1943 年 2 月，华中局指示军队和各级党政机关及时制定相关计划，发动生产，凡是军队机关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设法自给自足。各类群众团体也应响应号召，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生产运动，积极生产以支援军需。^⑥部队机关的合作生产效果显著，二师政治机关专门组建了生产组，组与组之间实行记工互助。^⑦第二师每个连队都参与开荒、种粮、种树、养猪、养羊、养鸡，每人每月有 1 以上的荤食品供应。1942 年，驻津浦路西的第四旅、联防部队和地方机关全年共开荒 7492 亩、植树 12.7 万株。其中第四旅收粮 2000 余石，自给蔬菜 3 个月。^⑧到 1943 年底，部队团以上单位都开办了合作商店，改

①春耕运动中应做的几件事[N].新路东报,1943-03-04(2).

②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68.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20.

④江苏省财政厅等.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 2 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09.

⑤师政治部机关生产节约公私兼顾的实施计划[J].淮南党刊,1944,(16):57.

⑥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淮南抗日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152.

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①

三、繁荣发展中的模范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事业的繁荣发展时期，根据地内涌现出一批与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深度联系的合作社组织，它们代表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水平，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事业发展的“排头兵”。

（一）模范互助组：骆滕云互助组

津浦路东大余郢的骆滕云互助组于1943年10月10日成立，最初有18户农民参加。骆滕云在来六县委的帮助下将农民组织起来，依照每家情况及互助组的要求来制定生产计划，大大增强了劳动效率，耕田效率提高14%，种麦效率提高47%。集体化劳动还带来了生活改善——全组采用集中做饭方式，一年节省粮食42.7石，折算劳动工时可抵51.4石粮食。互助合作减少了雇佣成本，普通农户既能增产增收，又能优先照顾抗日军属，这种看得见的实惠激发了积极性，全组不仅积极缴纳公粮支持抗日政府，自身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45年3月，骆滕云互助组在淮南苏皖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上被称为“淮南劳动互助的一面旗帜”，^②成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典型范例。

（二）综合型合作社：半塔民众合作社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经济中，建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是津浦路东半塔民众合作社。1940年9月，淮南抗日根据地遭到南京、扬州等地日伪扫荡，半塔区的榨油活动受到重大打击，给了一批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在此情况下，半塔区工人抗敌协会决定办一个生产合作社，“动机很简单，不过为了‘工人合伙做老板，替失业留退路’。”^③1940年8月24日，半塔区工抗举办了合作社准备会，集资174元并得到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赠送的两匹老马及200元股金。经民主协商，社员推举乡工抗会理事长张晶之为社长、杨言德为经理，故该合作社也称杨言德合作社。同年9月2日，半塔民众合作社正式开市，合作社采取薄利多销的办法，当月盈利800多元，乡农抗会员纷纷要求入股。至该年末，合作社股

①高国平,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116.

②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滁州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809.

③秦佐.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N].解放日报,1944-03-10(2).

金增长至 1305 元, 农民参股增加到 800 多户。1941 年, 合作社开始吸收商人、地主资金, 建立健全社内管理制度, 分柜、分类经营, 至 1941 年 1 月 30 日, 已集股 2967 元, 连同公积金共有资本约 8000 元。是年秋, 半塔镇 90% 的农户及半塔区 80% 的户数都入了股, 股本金达 12347 元。^①

1942 年, 为了打破敌人对棉纱的封锁, 合作社在半塔马厂办起了织布厂合作社, 并采取提供纺车、借出棉花收回纱、以纱换布等办法, 提高织布能力, 受到农民的欢迎。1942 年底, 全社织布 10 万多米。1943 年, 纺纱能力进一步提高, 合作社每月能收土纱 4500 斤,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本地区军民的穿衣问题。

1942 年, 半塔民众合作社成立了总社, 分社辐射到盱眙县的古城旧铺, 来安县的屯仓、兴隆, 天长县的铜城、汭涧等地。1943 年, 淮南区党委授予半塔民众合作社“淮南合作运动的先锋”的称号。至 1944 年, 半塔民众合作社从单一从事榨油的手工业合作社, 发展为经营各类商品, 兼营运输的大型综合合作社, 逐步承办了织布厂、农具厂等各类工厂, 分社数量增加到数十家。^②是年 10 月, 合作社再次召开社员大会, 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发展情况, “总计该社一年来给予社员的利益, 总值八百八十七万三千六百余元, 其中包括分红、廉价发卖农具、社员购货九五折、欠账卖药、以纱换布及贷出耕牛等。”^③社员人数更是扩展到全区总户数的 90%, 合作社在淮南地区已享有广泛的声誉。

1944 年 3 月 10 日, 《解放日报》在《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指出: “杨言德合作社是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最出色的合作社之一, 是敌后根据地发展合作运动的一个典型。”1945 年 3 月, 淮南区党委授予杨言德“合作英雄”称号。

(三) 合作工厂: 天高农具厂

1944 年春, 淮南天高合作社总社曾在铜城设一分社, 分社内设有一个消费合作社和一个碯坊, 集资不到两万, 股金来源多是工抗属, 钱少货少, 因而生意淡薄。至该年夏季, 新麦上市, 碯坊无米可碾, 营业更加萧条。于是天高武委会根据群众的需要, 提议办农具工厂。该提议很快为群众所欢迎, 原有门市消费和碯坊宣布停业, 合作社工作人员开始筹办合作工厂, 向周围市坊的群众征股。除

①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28-35.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博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博兴文史资料(第8辑)[M].1997:127.

③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为群众谋利八百万元[N].解放日报,1944-11-10(2).

在本市征股外，并向石梁、季桥、护杨等区发动群众入股。经过短期宣传动员，共征得股金 691400 元（每股 50 元），参加社员 1800 多人。同时得到淮南银行贷款 40 万元，股本共计一百万元以上。^①

股金规模扩大后，原料问题又成为制约工厂发展的难题。路东根据地煤铁较为缺乏，农具厂便请政府介绍到淮北购买。在淮北政府的帮助下，农具厂买到几十石煤和铁，并开辟了原料渠道，克服了原料不足的困境。1945 年 7 月 7 日，铜市农具工厂正式营业，天高合作社也召开第一次合作会议，决定将铜市农具工厂扩大，改为天高农具工厂，计划在三个月内扩大到三个冶炼炉。对于农具厂扩产的要求，淮南银行予以 50 万元贷款支持，农具厂扩建的资金问题便得到解决。对于人员配备问题，农具厂招募了几个冶匠，自己冶铁。至 1945 年 9 月，农具厂又开了两个小炉。这时已有铁匠 23 个，冶匠 12 个，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营业也随之发展。至 1945 年底，农具工厂的股金共计 1591400 元，其中曾投资克强烟公司 30 万元，木业合作社 4 万元，皮革工厂 2 万元，除了购置房产、船只等不动产 454000 元外，仍有流动资金 775400 元。^①

1945 年 12 月 13 日，天高农具厂召开股东会，会上各区群众要求农具厂在石梁、季桥、护杨等地设立分厂，并在工厂内附设柴草合作社。对于群众的要求，厂方积极响应并组织筹办。至 1945 年底，天高农具厂虽开办半年，但已闻名天高，与天高二十多万农民的生活密切相连。

第三节 合作社停办时期

1945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淮南地区的革命军队及抗日民主政权开始逐渐转移，根据地的合作社事业逐渐停滞。

1946 年，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淮南地区与南京仅一江之隔，因此战争一开始便首当其冲，国民党调其王牌主力整编七十四师向淮南地区进攻。为保存革命力量，淮南地区军政机关向淮北、鲁南转移，部分劳动互助组也跟随部队北上。1946 年 6 月，骆滕云带领互助组 30 多人，随军向苏北转移，从苏北转移到山东又从胶东渡渤海到达辽东，行程数千里，途中仍然坚持办互助组，坚

^①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工厂[N].解放日报,1945-09-26(3).

持生产互助。^①此外，群众集股筹办的合作社也暂时落幕，例如淮南地区的大型综合社半塔民众合作社，就因合作社干部杨言德等随军北上而停办。

部队机关的合作组织或交由政府，或跟随部队北上。1946年7月，华中局决定，“所有机关部队经营的商业，一律须于八月底结束”。^②各机关部队之公营商店结束后，可以保留随军合作社，由师、纵队、军区政治队、各分区、各县、边府各设立一个，各旅团不必设立。此类合作社专供给本部门部队之物资，如油、盐、菜、猪肉、文具，纸张、烟、日用品等，同时出售自己工厂的产品。各合作社所需物资以及必须购置之工业品，可向各地货管局、贸易公司采买。^③

随着解放战争的序幕的拉开，淮南抗日根据地历时七年的合作运动暂时落下帷幕，但合作运动的火种已经播撒在淮南地区的土地上。解放战争结束后，原根据地互助组成员陆续返乡，开展重建工作。各地民众合作社所留下的声望及经验，也为后续淮南地区供销社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滁州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810.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3)[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150.

第三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管理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历程中,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与群众动员的重要载体,既是巩固根据地经济基础的关键力量,也是凝聚民心、支援抗战的特殊纽带。本章以“合作社的组织管理”为核心,系统梳理其组织结构、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首先,从“组织类型”切入,分析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的职能分工及其在根据地生产、流通与金融领域的作用;其次,直面实践中暴露的深层问题,包括部分合作社脱离群众、制度缺失及社员与干部意识薄弱等现实挑战;最后,结合历史经验,总结通过坚持群众路线、强化政府扶持、完善财政制度及开展社内教育等措施,探索破解困境的路径。

第一节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组织类型

在敌伪封锁的严苛环境下,淮南抗日根据地群众在政府的领导下因陋就简,发展出手工业生产、消费、信用等多种类型的合作社,对增加生产、活跃经济、稳定金融起到了重要作用,支援了根据地建设。

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虽然以农业为主,但民主政权对发展手工业也十分重视,采取许多积极的措施,如确立营业自由政策、取消营业税、减轻店房租金等,且工商业者办工厂、组织合作社,只要不违反政府法令,一律给予保护和奖励。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执行,使根据地的手工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纺织合作社、卷烟合作社、榨油合作社在根据地内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一) 纺织合作社

1942年,日军加剧了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严禁棉布向根据地输送。1943年夏,日商又在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抢购棉纱、扰乱市场,导致棉布价格飞涨。“战前农民以一石米可换到10丈洋布,到1943年时,一石米还换不到2丈洋布。”^①加之根据地种植结构偏向粮食作物,植棉较少,加剧了根据地内的棉布紧缺的境况。在此情形下,根据地政府积极号召群众植棉。“淮南行

^①程必定.安徽近代经济史[M].合肥:黄山书社,1989:345.

政公署为奖励人民种植棉花，特筹款交各县贸易局购买棉籽二百石，交各县办事处、合作社，以成本售给农民，同时路东参议会驻会委员亦决议在自愿原则下，各户农民应以耕种面积的 5%植棉，此 5%棉田是年减半征收公粮，减半分租。”得益于根据地政策的支持，根据地棉花自给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合作社在发卖棉籽外，也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组织效用，充分将根据地内与纺织相关的生产要素纳入联合生产的组织形式。1943 年，华中局指示各级机关及群众团体有计划地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运动，多开办小规模纺纱织布合作社。^①在根据地政府及各级农抗会、妇抗会帮助下，各县区的纺织合作社纷纷建立。在马坝区，合作社与群众集股创办民众纺织厂，发展股金达七十万元，其中许多系以劳力入股，股份扩大后，群众纺纱积极性更高。在盱嘉地区，自来桥（属嘉山地区）之纺织合作社新制的一百架纺车，三日内全被群众领完。仅在一年间，盱嘉七个区的纺织合作社共集股约 160 余万元，其中民众股金约占二分之一。^②盱嘉七个区的农抗还与纺织合作社召开代表联席会议，决议设纺织工厂，并规定其他各区也都设分厂，代买并担任分配棉花、收买棉纱及卖布换布等事宜。1944 年，盱嘉地区总计成立的纺织小组已达 267 个，参加纺织合作社的有 5880 个社员，纺织厂所收民间股金共达 501278 元。除纺织厂特约 665 架纺车纺棉纱给以工资外，当地农民齐新置 2349 架纺车纺纱，向纺织厂或其领导下的各合作社换布。纺织厂配置了数十架织布机，招请外地技术工人，并教本地工人织布，以应群众需要。1944 年，该厂为解决群众缺棉困难，又新订出以一斤纱换两斤花的办法，并对纺户采取记折制度，月终结账，并规定纺织超过三斤者，给以物质奖励。^③

根据地内的大型综合型合作社在纺织运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2 年，津浦路东根据地内的半塔民众合作社，以领棉纺纱后每斤给工资 52 元（当时纱价也不过 50 元）的工资政策激励群众参与纺织。^④并推行“以纱换布”的政策，纺出的土纱 1 斤 3 两换 1 斤土布，以解决群众纺纱织布的销路问题。^⑤对于

①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 2 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09.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279.

③盱嘉民众纺织厂概况[N].解放日报,1944-04-30(3).

④秦佐.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N].解放日报,1944-03-10(2).

⑤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78.

纺车不足的情况，淮南银行批准半塔民众合作社“分期出辅币 85 万，于是能连续打造纺车 750 辆。”^①半塔民众合作社还在区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纺织厂，地址设在半塔马港，工人近 200 人，配有木制手摇纺纱车纺纱，90 台铁木制织布机织布，生产品种多达 20 余种。^②半塔民众合作社织就的布价格低廉，“一斗粮食可以换到细布三尺、土布六尺粗布八尺”，^③深受根据地群众欢迎。1942 年底，全社织布 10 万多米。1943 年，合作社纺纱能力进一步提高，合作社的纺织部门每天收纱 150 斤，3 个月收土纱万斤，基本上解决了周边军民的穿衣问题。^④半塔民众合作社也积极发动周边群众参与纺织运动。“1944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在半塔民众合作社的支持下，半塔区妇抗会召开全区各级妇抗干部会议，讨论通过了各乡建立纺织合作社，通过开展妇女纺织竞赛活动的办法，动员和组织全区广大妇抗会员开展纺织竞赛。”^⑤

在克服敌伪封锁的过程中，淮南抗日根据地逐步构建起纺织互助组、纺织合作社、纺织工厂逐级递进的运作结构，三者间互相联动，协同配合，让根据地内的土纺土织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纺织合作运动。在政府与合作组织的通力协作下，民众和部队机关用布逐步自给，缺棉少线的窘迫局面大为缓解。

（二）卷烟合作社

淮南地区素有种植烟草的传统。据统计，1936 年凤阳烟叶种植面积即达 14 万亩，充足的原料供应让卷烟成为根据地对外出口的大宗。^⑥因根据地出产的卷烟质量上优，且为日常必需品，故敌顽对根据地的卷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依赖性，形成了根据地对外贸易上巨额出超。为保护卷烟这一重要财税来源，淮南行政公署禁止敌区香烟进入根据地销售，并实行较高的进口税价，“对进口香烟课以重税，税率达 20%至 30%。而对本地产烟，机器卷烟业，每月按营业总收入额征 5%的税”^⑦

在政府政策的策动下，淮南的集镇手工卷烟业发展很快，小集镇有一两架手卷机，大集镇有几十个手工卷烟厂、百余架手卷机，由于市场需求量大，很快就发展到淮北。半塔民众合作社出产的卷烟更是个中翘楚，甚至远销敌占区。1944

①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2.

②安徽省滁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皖东文史(第 1 辑)[M].皖东文史编委会,1996:219.

③秦佐.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N].解放日报,1944-03-10(2).

④《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淮南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38.

⑤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69.

年2月,半塔民众合作社增设卷烟部,经过两年的发展,合作社卷烟部仅在1944年上半年就生产香烟22490余条,除向附近乡镇销售,还大批运销苏中、苏北两抗日根据地,极大地充实了社内资本。^①

新四军二师的合作社对根据地卷烟业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抗战初期,铜城群众曾集股创办“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神龙牌”香烟供应市场,但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使该厂趋于倒闭,几乎难以维持。新四军二师领导了解到这个厂的困境后,指示二师的合作社支持该厂一部分资金,以解燃眉之急。至1942年底,私商要求与二师合作社合股经营。经请示上级批准,投资收股,成了公私合营烟厂,同时派干部、战士进厂参加生产和管理。^②1944年,合营公司每日产烟2500条以上,资金达1亿数千万元,每月生产“飞马”香烟1500箱,声誉在名牌烟“大英”之上。“飞马”牌香烟大量出口到敌占区,换回根据地紧缺物资,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三) 榨油合作社

抗战前,淮南地区芝麻、花生、黄豆等油粮均有一定出产,但民众的食油大部分还依靠外来输送,多由商贩从无锡、常州等地进货。由于外来油价低,本地油坊在竞争中逐渐停业。抗日战争爆发后,食油主要从淮北输入,其次为嘉山的自来桥等地,本地的榨油业仍是较为低迷。

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民众的食油问题。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食油禁运与封锁,扭转根据地榨油业落后局面,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禁止油料运往敌占区,同时发放大批贷款,帮助合作油坊建立和私人油坊复业。根据地政府同时规定,“凡私人经营的榨油业,除须依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付给工人外,其他一切均系自由经营,只有当食油运输出口时,才按照政府规定,缴纳出口税,集股成立榨油合作社,利用冬季农闲之时,自己榨油。”^③油坊所出产的油,在根据地内销售,一律免税,自由流通。由于民主政府的措施得力,民众发展榨油合作社的积极性高涨,根据地市场食油不仅能自给,还能向敌占区销

①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86.

②高国平,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506-507.

③安徽,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05.

售。仅半塔民众合作社的油坊，食油年产就能达到 171500 余斤。^①

二、消费合作社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指出，“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②抗日战争时期，农村经济较为封闭，迫切需要流通领域的合作社以活跃农村经济。1940 年 4 月，中共中央指出：“依靠银行建立公营商店，借此帮助真正群众性的生产与消费的合作社，收买土货，调剂物价，发展生产，既补助收入又改善群众生活。”^③1941 年，《解放日报》的社论也强调，“消费合作社这一类型，在便利人民交换与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上，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的”。^④

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农业生产快速恢复，带动了根据地的商品流通，繁荣了市面，促进了消费领域合作社的发展。在根据地内，消费合作社作为根据地商业的主体力量之一，各区乡镇都办了消费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在群众中信誉较高，因而相当多的农民自愿入股入社。根据地内的消费合作社所售商品价格便宜，一般都低于市价一成左右，且货源充足，购买方便，不仅有利于商品交换和生产以及生活用品的供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的过分剥削。^⑤消费合作社与群众日常生活高度联结，乡一级合作社对群众的影响尤深。例如莲塘乡合作社，在开办之后“东西样样比市面上便宜，譬如洋布比市面上公道头十元一尺，香油公道头十元一斤，油的分量也比市面上又多又纯，这样大家都看到了合作社的好处，买东西也都到合作社买，连周塘乡、七星乡和木店的老百姓都到莲塘乡合作社来买东西，因此莲塘乡合作社的营业就一天一天发展起来。”^⑥1944 年旧历新年初，莲塘合作社从母社分离，开始独立营业，总社抵投资十万元后，该社社长高荣、副社长林仲平即召集理事会议，并请农抗理事参加。会上合作社负责人指出自主营业的优势，与会代表决定扩大股金，开设油坊一座。会后经各理事

①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88.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 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10.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61.

④海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概况[N].解放日报,1941-11-05(3).

⑤程必定.安徽近代经济史[M].合肥:黄山书社,1989:350.

⑥莲塘合作社扩展营业,群众纷纷自愿入股[N].淮南日报,1944-04-11(1).

的发动，群众入股非常踊跃。至1944年4月，莲塘合作社发展的股金计法币12285元，其他资产按当时市价可折成法币45320余元。^④

三、信用合作社

1933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如此评价：“在中国甚至于最落后的地方，农民平均总要出卖他自己的生产品的百分之四十，在城市上购买百分之四十的需要品。”^①农村经济结构单一且脆弱，农民时常受到“剪刀差”的影响，倘若发生天灾人祸，农民不得不求诸高利贷，农村经济便陷入恶性的借贷循环。国民党政府曾设想以合作社借贷来提振农村经济，然而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据《中国农村》记载，1940年，“中国合作社的社数，已有十万多个，放款也达五千八百万元以上，其间的信用合作社占最多数，而大多数的信用合作社又是不信用的”。^②国统区的信用合作社在开办过程中大量利用了银行资本，而出资的资产阶级和借贷的农民阶级天然存在认知上的隔膜。“从没有到过农村的资本家满以为‘钞票在手，谁个不求’，把农民当作一个拜金主义者”。^③但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农民们常年游离在破产的边缘，保守心理成为多数农民的生存法则，对待信用合作社常持观望态度。除农民心理上的排斥外，土豪劣绅在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上起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农村的信用合作社要么为豪绅所直接操纵，要么便被豪绅所设名组织，而从银行下发至农村的低息贷款，经过豪绅把持的信用合作社后便成了变相的高利贷，合作社反变成农村中封建势力剥削农民的新式工具。^④在保守心理与豪绅剥削的两相影响下，农民只能继续沿用传统的借贷模式，从合作社所贷款项仅占极低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种类	合作社	亲友	地主	富农	商家	钱局	其他	合计
现金贷款	1.3%	缺失*	9.0%	45.0%	缺失*	8.9%	10.1%	100%
粮食借贷	——	10.9%	13.6%	46.6%	11.3%	——	17.6%	100%

——1942年浙、陕、甘等省农民借款来源

资料来源：张法祖. 工业合作与农村经济[J]. 中国农村, 1941, (8): 08.

对比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信用合作社在乡村借贷中起到了更为实际的

①许毅. 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320.

②钱孟邻. 信用合作社为什么不信用[J]. 中国农村, 1940, (11): 09.

③张锡昌. 抗战三年来的合作事业[J]. 中国农村, 1940, (10): 04.

作用。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对合作社稳定乡村金融，活跃乡村经济的作用十分重视。1940年路东联防办事处颁布了《农民借贷所组织大纲》，指定将过去农行贷款及地方公款的一部分拨为借贷所基金，再由借贷所向大户借款转借农民，并强调“最好各地合作社兼办借贷所，实行低利借贷”。^①同时，大纲中也规定了此类贷款的作用，即“一方面帮助农民生产（如买猪羊买稻种买牛及生活所需等），一方面与高利贷资本作斗争。”^②在大生产运动的浪潮下，农民对生产资金的需求更迫切。1943年，华中局也指示各地区“应发出大批款项作为农业生产贷款之用，并鼓励各地合作社向农民举行各种贷款如种子、耕牛、水利、肥料、纺织之贷款等。”^③信用合作社发放了大批生产贷款，为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

与国统区对比而言，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信用合作社之所以能取得实效，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国统区信用合作社的组织架构超出了基层的组织能力，合作社为着保证账目的有效而一味增添手续，导致帑费甚巨。仅是一般的基层合作社借贷法定手续就需呈文、登记、印发等环节，等放款机关到达基层还要农民另填表格，另制申请书。在走完这繁琐流程后，农民也未必能全数拿到贷款。^④而在淮南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早已深入乡间巷角。合作性组织在乡村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与群众直接相连，确保农贷能真实为群众所得，且贷款流程简洁，提高了农贷的使用效率。（2）根据地政府提出，“农贷不与提高和发展生产相联系，势将变成慈善性质，丧失积极意义。”^⑤这说明根据地政府认识到，单纯依赖依靠经济上的“输血”不足以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农民固有的认知模式和乡间传统也非单纯的经济事物所能撼动。因此，只有将农业贷款与生产运动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农贷的价值。（3）土豪劣绅的剥削在农村是普遍现象，而且越是靠近基层，土豪劣绅们的压榨就越频繁，加剧了乡村借贷的困难性，而根据地内“打土豪”的工作驱逐了大量土豪劣绅，为开展借贷活动扫清了障碍。

①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185.

②江苏省财政厅等.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2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17.

③钱孟邻.信用合作社为什么不信用[J]中国农村,1940,(11):09.

④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66.

四、 其他类型的合作社

（一） 运输合作社

运输合作社在沟通各解放区的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华中局曾指出，各个解放区经济政策要有利于贸易事业上完全协调起来，使各个解放区之间产品互相交流，互相调剂，使生产品销路扩大，更便利我们与敌伪地区进行等价交换，争取对外贸易斗争的胜利。“兄弟区物资通过本区需要运输工具（驴马草）本区贸易机关与商行应有义务向当地运输机关或运输合作社、乡、村劳动群众接洽帮助运输”。^①在淮南抗日根据地，运输合作社往往是为综合社所兼营。如半塔民众合作社专门就设有运输部，有驴 100 头，主要运送合作社出产的商品。半塔总社也与分社一同组织牲口运输队，便利与分社间的贸易往来，并向根据地外输送商品。1944 年，半塔总社及分社经由运输部运盐 1500 担，盈利 800 万元。^②

（二） 医药合作社

抗日战争时期淮南抗日根据地经济条件较为困乏，群众文化程度有限，加之气候干燥寒冷，导致天花、白喉等疫病泛滥。1943 年，淮南根据地政府在天长和汊涧成立了医学会，提议在乡镇设置医疗合作机构，使中西医可以良好地结合起来，为病人治病且免收手续费，让人们有地方、有条件治病。此外，淮南行署还设有卫生处，专署设有卫生科，统一领导全区的卫生工作。在主要集镇，卫生科发动群众办保健堂，这是党委支持，政府发起，群众自办的合作性医疗卫生组织。它的资金来源一是靠群众集资，每户出 2 元作为一股（有的户以粮食和鸡蛋折钱入股）；二是由区合作社拨款。此类合作性组织的宗旨和任务是为群众防病治病，同时担负当地机关、学校、基干民兵的医疗任务。保健堂规定门诊、出诊不收费，药费比照私人药铺打 8 折至 7 折，困难户可以赊欠，抗属、烈属优先诊病取药，还免费为群众打预防针、普种牛痘、开展防病知识宣传等。保健堂服务态度好，药品货真价实，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③此外，医药卫生也是一些民众合作社的福利性业务。在 1940 年，半塔民众合作社就曾购置 300 元西药，

①安徽,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29.

②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200.

③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332.

为贫苦群众治病。^①

（三）耕牛合作社

在旧政权时代，淮南地区的耕牛被偷运出境，敌伪也大肆掠夺、宰杀，致使耕牛严重缺乏。根据1942年根据地政府对路东地区9个县区9个村保的调查显示，“465户农家使用耕地182969石种（每石约合6.3亩），共有耕牛231条（此地区耕地牲口全系牛），以每条牛耕地5石共缺耕牛136条，每户缺牛0.29条，即每百户缺牛29条。”^②对此，根据地政府规定严禁宰杀和出口耕牛（出口敌占区），实行耕牛登记等保护措施，以恢复牛力。在开展农民互助合作工作中，把多买牛、多养牛、合作养牛，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地政府“贷给一条牛腿都没有的贫农买牛，推动他们组织耕牛合作社，实行‘专养公用’，繁殖的牛犊由公、私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③此外，根据地内还存在一种由群众自发成立的合作养牛组织——官牛小组。官牛由一户专养，其他各户负责出一部分牛草。农忙时，采用谁使用谁喂养的原则，农闲时则轮流喂养。牛价下跌，牛卖价低或者牛死了，损失由参加户平均摊。^④

第二节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实践困境

由于根据地内外的复杂形势，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敌伪封锁、物价飞涨、经济袭扰等外源性因素，经济基础薄弱、群众意识淡薄、专业人才缺乏等内生性问题，反映到合作社经营层面就表现为群众问题、制度问题以及干部问题，深度制约着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为应对上述困境，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将党中央的宏观政策与根据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共性原则，让合作社克服了经营中的掣肘难题。

一、部分合作社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

合作社脱离群众主要表现是在经营过程中盲目发展，没有顾及群众的实际需要。1942年春，半塔民众合作社门市部添了化妆品、皮包、自来水等脱离群众

①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29.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208.

③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13.

④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71.

实际需要的货品，遭到群众的一致抵制。“最多时一月两次跑南京办货，花样达三四种，货越多群众越不上门，群众都说：‘买钢笔我们不会写字，买绸手帕我们不嫁姑娘’。”^①1942年，半塔民众合作社忽视群众意见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分红时，合作社“收新股约一万二千元，分红四次，每元股本共分去两元二毛，最后一次未经社员同意替民兵买了子弹。”^②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群众思想在合作社干部中尚未完全树立，干部对群众的诉求不够重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合作社干部对根据地经济环境缺乏相关认知，对合作社的经营也缺乏经验，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就造成了经济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失衡。

二、政府扶持力度有限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初创阶段，始终面临着战时政权建设的特殊矛盾：一方面，分散的小农经济亟须通过合作化实现生产力整合；另一方面，根据地在财政紧张，人员配给不足，军事斗争形势严峻等各类问题的现实约束下，难以对合作社形成系统性扶持。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1943年前政府对合作社工作的资源配置和制度性支撑上。

从客观环境看，根据地创建初期的生存压力主导了政府政策倾向。日军频繁“扫荡”与国民党摩擦交织的军事危机，迫使政府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武装斗争与基层政权巩固。在此背景下，合作社建设既缺乏专项资金支持，也难获稳定的干部队伍保障，正如时任淮南苏皖边区党委书记刘顺元所述：“给合作社的干部多是各方面不要的，出席代表会的代表多是指定的”，基层政权普遍将合作社视为配合性工作而非中心任务。^③

政府扶持的不足，间接致使合作社发展呈现“群众自发主导”的特征。在缺乏政府有效组织的情况下，合作社多由工人抗敌协会、农民抗敌协会等群团组织发动，其规模局限于自然村层级，功能以应对春荒借贷、代购农具等应急需求为主。由于未能形成“以党为领导的群众运动”，此类合作社往往陷入“三无”困境：无统一章程规范经营行为，无专业人才提升管理效能，无政策倾斜抵御市场

①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431-432.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435.

③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40.

风险。这种政府扶持力度有限的状态，深刻反映了战时根据地军事斗争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

三、合作社制度尚待完善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在建立之初较为放任自流，在营业上缺乏必要的制度管束。1942 夏季，半塔民众合作社为了扩大影响，刺激股金发展，“把油价降低到一元二毛一斤（市价是二元，芝麻市价九十元一石，社甩存的还是三十五元一石的），私人油坊完全停闭。汉涧竹镇都运道来半塔买油，逢集一拥几百口子，从窗口递钱递油，挤不上的就说怪话，每集千斤油还不够卖。因为很大一部分转到商贩手里发洋财去了，闹了个把月才改正了。”^①1942 年，半塔民众合作社开办织布厂，“织机二十张，工人三十一名，到年底，洋纱被封锁（当时还未提倡土纺），布坯难推销，工资难以维持雇工生计。在管理上有严重打骂现象，资金也不够周转，明赚四千元，实则大蚀本。”^②

财会制度的缺漏，也是制约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财会制度的不健全造成合作社的账目不清。1942 青黄不接之际，半塔民众合作社由农抗经手，贷出麻饼二千片，现款两千元，秋季贷出麦种八十五石，但由于社内账目不清，到 1944 年还有四十石未归还入账。^③在入股制度上，受旧有观念的影响，过去合作社开办过程中多强制性摊派股金，导致群众对合作社的认识仍停留在旧观念中，群众对集股筹办合作社的反响偏于消极。如半塔民众合作社在最初集股时，“许多人都说‘什么合作社，还不是募捐’有些入股的工人也以为是募捐”^④莲塘乡合作社在 1943 年冬月开始营业时，群众都不十分了解，“个别的人甚至于说，还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因此当时群众参加的股金只有 14060 余元，后来全靠旧铺合作社供给货物和帮助资金的周转，才能够开办起来。”^⑤此外，合作社的入股制度也较为僵化，难以适应根据地形势的发展。例如半塔民众合作社最

①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432.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432.

③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433.

④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为群众谋利八百万元[N].解放日报,1944-11-10(2).

⑤莲塘合作社扩展营业，群众纷纷自愿入股[N].淮南日报,1944-04-11(1).

初入股限于工农群众，且最高是五元，不符合各阶层经济合作共同繁荣的方针。合作社入股的方式较为机械，多是资金入股，减少了合作对社员的吸引力，也妨碍合作社的更大发展。

四、社员与干部的意识有待提高

合作社的发展要靠群众的广泛参与，也需要干部的积极引导，群众与干部构成了合作社发展的主体性因素，但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群众与干部的主体性作用略有缺失。在群众方面，群众的生产情绪历来不高，“这是长期的残酷剥削与长期的匪乱所致，群众长期地感觉到，生产多了于自己并没有好处，反会惹祸，只好得过且过，敷衍了事。”^①这种低落消极的生产情绪阻碍了互助合作运动的扩大化，也限制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此外，群众的个体化生产模式与旧有观念也是限制合作社发展的因素。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由于小农观念的影响，加之缺乏集体主义思想的教育引导，部分农民群众揩油的现象时有发生。1940年，半塔民众合作社本着利好群众的初衷，购置医药为贫苦群众治病，“部分农抗理事有私情，有的宽裕户亦捞油领药。”^②这就造成了医药资源的浪费。在合作社的畜牧组，小猪有一部分经农抗证明与中贫农合喂，但常有人以小换大，以瘦换肥，小猪始终养不大。在农民的种种消极行为中，对合作社影响更大的则是部分群众盲目赊账，妨害资金流转，导致合作社蚀本。社员从赊账得到的好处与从买卖货打折得到者有性质上的不同，打折是从合作社利润中抽出一部分给社员，是返回社员自己的东西；而赊账却是直接使合作社蚀本，就等于社员剥削了群众，特别是赊账最多的大半是富裕社员，就更引起社员及群众不平。^③

部分工人群众的思想认识也处于较为落后的层面。在天高农具厂，工人的生活待遇较为优厚，每月除工资外，厂方供给伙食，每天七元菜金，每逢初一、十五歇工。但其中有些工人还提出初八、二十三也要歇工，否则要拿双工钱。部分工人完全以对待老板态度对待工厂，时常以技术要挟，生产毫无计划。其次是不爱惜公物，有的偷原料，偷成品；工作日久感到疲倦，消极怠工，加之工厂无适

①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225.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429.

③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8.

当娱乐，偷工聚赌、打架、吵嘴、不听厂方劝告等现象层出不穷。^①

在干部问题上，淮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指出淮南地区的干部“享乐主义倾向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倾向尚只是开始揭发”“不正的干部政策”三个方面问题。具体到合作社工作上，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郑位三评价道，淮南地区党的部分干部在领导合作社经营的过程中存有贪污腐败和与抗日商人争利的现象，让党的干部沦为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②陈毅也曾指出华中根据地的“不少新的工农干部本质虽好，而旧习未除，既无能力和办法应付新局面，上级又不告诉他，只能照办法，甚至因袭了国民党旧政权的一些恶习气。如贪污腐化，敲诈勒索，对上哄骗，对人民欺压，救灾和账款先救干部自己，有人情的多分，无人情的农民甚至分不到。”^③

由于合作社与经济工作关联密切，加之部分干部思想较为落后，因此合作社干部的贪污现象屡见不鲜。“铁佛乡理事冯树安分了红去不发给社员，自己拿去做生意，发蜗蜗油及洋蜡烛给人家抵红利；半塔乡理事刘忠发卖十石芝麻给社里，掺假二石……半塔社张健借社里钱放高利贷。赊账、施药很多贫农应得的得不到，富裕户不应得的反而弄到手。旧铺社长潘云飞（已被军区司令部枪决）用了进货以少报多，出货以多报少的方法，贪污十三万元以上。”^④贪腐问题犹如沉疴，深度阻碍着合作社的发展。

第三节 淮南根据地合作社困境的应对措施

一、坚持群众路线

（一）保障群众利益

毛泽东曾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强调“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⑤群众的观点是合作社组织管理的根本观点。在重新审视脱

①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工厂[N].解放日报,1945-09-26(3).

②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217.

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1075.

④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434.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

离群众的问题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一改往日弊端，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具体而言，半塔民众合作社重拾群众路线的发展路径，将合作社门市部内不符合群众需要的化妆品、皮包等清空，只卖油、盐、布等日常必需品，并通过以社员买货、三节（端午、中秋、旧年）打折与卖货分红来为工农群众谋福利，使群众少受市场物价波动的剥削。^①此外，在联系群众在团结各阶层群众上，中小商人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参与者，而且其所受剥削与一般群众相似。对待他们，合作社也尽力扶持，例如“合作社出品的卷烟价格甚至高于市价，以帮扶各小卷烟厂。”^②

（二）加强民主生活

社员大会是合作社联系群众的重要窗口，规范并重视社员大会的组织是加强民主生活的重要举措。在半塔民众合作社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办过程中，“选代表，提意见等，就准备了个把月，他们还准备以后如征股、分红、打九五折、提高农产品价格等，都要在各乡村开群众会，解释误会，杜绝私弊，发动竞赛”。^③为了提高社员大会的组织程度，合作社还将互助组吸纳进社员大会的产生程序。“以前社员是散漫的，有的偶尔以村为单位开几次社员大会，代表多是指定的，就是选举也是马马虎虎。因此社员有意见难于向上反映，社里有教育解释到不了下面去。现在情形变了，劳动互助小组也就是合作社的细胞组织，社员不参加互助的，另编社员小组，并产生代表开代表会，代表会再选出乡合作委员会，合作社从此有了比较密切的民主生活。”^④基层群众所反映的意见及要求更容易被重视，根据地政府和合作社的指令也更容易向下传达，减少了误会与嫌隙的产生。合作社与工人的联系也更为紧密，各类工人组织愈发健全。“以前职工是散漫的，教育机会少，劳动效率一般比私人作坊还低，现在情形也变了。纺纱的有纺纱小组，织布的有织布小组，小组之上有纺织委员会，工厂工人则有职工会。”^⑤由于职工会的教育解释工作，配合上各种公私兼顾办法，卷烟工人的产量几乎翻倍，油坊工人节约原料三分之一以上，偶尔外部工资有所上涨，工人也不为所动。

二、提高政府扶持力度

（一）加大政策扶持

①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6.

②秦佐.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N].解放日报,1944-03-10(2).

③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9-40.

在根据地内形势逐渐稳定后,中共华中局及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对淮南地区的合作社发展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不断出台政策来扶持合作社发展。在1943年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中,发展合作社与发展生产运动并列成为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重点。^①1944年,淮南苏皖边区行署第四次委员会议将发展合作社作为根据地政府的基本工作之一,要求各地政府“普遍发展农村副业,增加水田,继续造林,加强农业技术实验与指导,发展手工业及合作社,财政工作保证今年不增加人民负担和不借粮。”^②在1944年午收中路东区委支部把合作社的重大工作当作群众运动去做,午收正忙时劳动互助是第一个中心工作,合作社在各地建立代销处是第二个中心工作。^③

（二）完善财经工作制度

1942年,华中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同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草案》出台,对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做了明确的规定。津浦路东、路西两地的联防办事处也随之制定了详细的财政收支的办法,在财政体系上逐步建立了四大系统,即收入系统,支付系统,保存系统(即金库),审核系统,为公营合作社与政府财政的对接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

1943年新铺财经会议以后,淮南区党委对财经工作认识升入新的阶段,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重视不断加深,特规定各县委下增设一个财政经济委员会,成为县委掌握财经政策,检查督促各财经部门工作之机构。各县委组织部专设组织干事一人,专门担任财经工作部门内党的工作。^④随着从上至下的财政制度的健全,合作社在根据地经济生活中也日益规范。

（三）健全货物管理体系

1940年7月底,津浦路东联防办事处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货物检查处、税务总局,粮食局、会计局,经济建设局、总金库等,加强对财经工作的建

①安徽,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25.

②淮南苏皖边区行署第四次委员会议[N].新路东报,1944-01-14(2).

③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40.

④安徽,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45.

设和管理。^①1943年春,由根据地进出口货物检查处与贸易局合并而来的货物管理局成立,简称货管局,成为主要工商管理部门。当时的工商管理机构为适应战争环境,普遍设置了武装缉私队。货管局在根据地内部贯彻自由贸易、反对垄断、活跃市场、繁荣经济的方针。对外则实行贸易管制,并以公营商业为中心组织合作社商业,保护私营商业,与敌人的套购物资、经济封锁,奸商走私资敌,进行针锋相对斗争。^②同时,货管局还坚持“组织公营商行、公司,帮助合作社调剂根据地内物资,团结商人,限制与孤立奸商,集中力量与敌伪作经济斗争。”^③货管局通过与公营商行、公司协同运营,保障了根据地内合作社等经济组织的运销活动。

(四) 制定保护性的税收政策

在税收方面,抗日根据地政府一般采取“有钱出钱,钱多多出”的原则,政府一般税率都较低,只占总收入的1%~5%,同时,还执行奖励生产的原则,对工业投资,合作社股金,水利投资只征收益税,而不征财产税,对一些急需发展的自给工业以及家庭副业实行免税。^④1943年,淮南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公布了税率表,其中规定“税率表所列各税,除群众性的消费合作社得免纳营业税外,凡公营贸易企业以及政府、部队、机关团体,均须照[章]纳税。”^⑤此外,为扶持根据地内部产业发展,政府除减免赋税外,还采取差等缴纳的方式,如下表所示:

种类	品名	从价税率
布匹	厂布	5%
	斜纹布	5%
	白洋布	5%
卷烟	各种公司烟	20%
	小公司烟	30%

①《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淮南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425.

②安徽,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220.

③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214.

④赵凌云.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135.

⑤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选编(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111.

商品作物	棉花	15%
	麻	15%

数据来源: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选编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111.

对于棉麻等战略性物资,根据地政府往往采取较高税价,以减少对外部的依赖。而对于布匹,由于根据地较为紧缺,因此采取了较低的税率以增加进口。对于卷烟业,因其是淮南抗日根据地出口创汇的重要渠道,所以根据地政府对外来卷烟课以重税以保护本地卷烟业的发展。

(五) 加大金融支持

1942年2月,滁州津浦路东区党委、淮南行署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精神,在天长县葛家巷成立了淮南银行,由龚意农担任行长,属淮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领导。淮南银行的成立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在大生产运动中,淮南银行贷款支持土纺土织,援助了大量纺织互助组、纺织合作社与纺织合作工厂,使淮南根据地发展了10万多架家庭纺纱机,几千架织布机,仅半塔民众合作社就得到了58万元贷款,打造纺车750架。淮南银行还发放工业贷款,重点支持群众工厂,如由天高合作社铜城分社发展而来的天高农具厂曾先后获得淮南银行的贷款。^①

三、完善合作社内部财政制度

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②经济工作是合作社的主要工作,而经济制度则是这一工作的基础保障。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在根据地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总结发展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几种营业上所必需的财会制度,对工资、入股、分红等相关制度也进行了规范,让合作社的运营机制更为完善。

(一) 财会制度

财会制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是社内其他制度确立的前置条件,资金独立个别负责制度让合作社的资金流向有据可查,规范了各社财政。在此前,根据地的合作社大多采取一种家长式的由总社统筹统支方法,导致门市交易、成本核查、负

^①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工厂[N].解放日报,1945-09-26(3).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5.

债计算等工作缺少必要的财会制度加以统查，由此造成账目上收支混乱，给业务盈亏的甄别增加了难度。该项制度实行后，干部责任心增强，各部门收支更为清晰明了。

经营费预决算制度的建立与中央廉洁财政的号召息息相关。1939年，中央就曾强调要严格建立预决算制度和会计审计制度，“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①。1941年2月，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公布的施政纲领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廉洁之财政系统，严格执行预算结算之审计制度”^②。以前这个制度未建立，“各社各单位凭良心开支，有的单位常常有毛利，无净利，赚几文钱都开支掉了。”^③1943年该制度建立时，项目分得不尽合理，节约上虽有成效，但仍未得法。经过一年余的时间，经营费范围项目范围逐渐缩小，商品成本计算也更精密了，大幅提高了节约开支的效果。

（二）工资制度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中，工资虽然掩盖了一定的剥削关系但仍具有进步意义。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指出，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但工人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④1945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⑤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规定工资的最低标准为，使普通工人最低能养活一个半人，同时给予一定的生产任务，以保障多数职工的生活。^⑥1945年，路东公营工厂及合作社工厂组织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盱嘉天高及半塔民生工厂的工资计算办法是比较可取的。厂方应订出正确的生产任务标准，超过任务，应给予奖金。^⑦该工资制度的实行激发了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平衡了工人利益与企业家利益，在保障工人生活的同时也保障了工厂的盈利空间。

在工资变动问题上，根据地的经济环境并不稳定，物价涨落频繁，间接导致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8.

②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13.

③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5-36.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66.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2.

⑥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7.

⑦路东公营工厂及合作社工厂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摘要[N].淮南日报,1945-06-10(1).

工人工资的折损。对此，合作社的工资变动相较于物价涨落有一定的缓冲时间，并非即涨即落。对工资变动期间工人之损失，合作社还会有适当之补偿。^①

（三）入股制度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采取社员自愿入股，股金每股 1 元、2 元不等，如滁县大柳乡运盐合作社每股 2 元，多者不限，贫苦人家还可以两家入 1 股。马坝区民众纺织合作社可依劳力入股，为此发展股金 70 万元。淮南天高农具工厂由天高合作总社发展而成。筹办合作工厂时，除本市征股外，还向石梁、季桥、护杨等地区发动群众自愿入股，当时规定每股 50 元，共征得股金 691400 元，参加社员达 1800 多人。^②

半塔民众合作社创建时，规定入股限于工农群众，每股 1 元，1 人最多入 5 股，社员股金 174 元。但该项入股制度限制了集股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合作社股金规模的拓展。毛泽东指出，“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③因此只要不妨害群众公利，合作社可适当放开入股限制。1941 年 1 月，路东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鼓励以大量资金参加合作社”的决议，促成合作社入股观念的转变，开始吸收商股及地主资金。该社 1 年之内扩股数十万元，社员增至 8381 人。

群众入股的形式也更为多样，实物、劳力均可参股。1944 年，藕塘合作社在社员大会后，经各理事的发动，群众入股非常踊跃，“燕山村张性松先生愿参加一棵檀树做油尖，乡长宋峯也参加两棵檀树做油尖。”各项实物股金有如下数目：“（一）法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五元；（二）大芦秫（高粱）五担八斗；（三）白稻二十二担三斗；（四）大米一担三斗；（五）黄豆一担；（六）竹子一百斤；（七）草一百斤；（八）檀树三棵，栗树二棵，按当时市价折成法币四万五千三百二十余元。”^④

在与商人合股问题上，小商人受剥削程度与农民群众相差无几，所以合作社采取的是团结其力量并扶持其发展的措施。包括：（一）适当向其贷款，帮助他们开辟新的营业，或转入手工业生产。（二）充分利用其生产力，以替代合作社

①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6.

②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工厂[N].解放日报,1945-09-26(3).

③毛主席谈合作社业务[N].解放日报,1944-07-04(1).

④群众纷纷自愿入股,莲塘合作社扩展营业[N].淮南日报,1944-04-11(1).

生产或作为合作社生产的补充。半塔镇的油坊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三）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使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自愿向合作社入股，或者为合作社服务。

（四）引导他们以资金、生产工具与合作社合股营业，按一定比率分红，再加上打折等隐性福利，小商人参与合作社营业并不比私人营业获利小，而且免除了高利剥削。^①对于大商人，合作社规定，只要是有利于群众，有利于合作社发展，亦可作各式各样的合股营业。

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入股制度已演变为：（一）不论何人，只要服从决议，即有入股资格。（二）股额不限，半塔民众合作社就有股额上万者。（三）货币、实物、劳力均可入股。（四）自由入股，自由退股。

（四） 分红制度

“合作社是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各阶层人民大众联合经营的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②。私有财产的基础决定了合作社的分红方式主要是按资分配，即以群众入股的份额为标准，参照社会平均利润，进行公平分配。分红时间一般按一个季度为限，便于群众较快地得到回报，以保障群众的生活。在种类上，包括公积金、社会公益事业金、工作人员奖励金等。

（五） 工厂与工人管理制度

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中强调指出：改革工厂中的机关化等不合理现象，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③工厂企业化革除了工厂组织中机关冗余的倾向，对提高工厂组织能力和生产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5年6月，淮南津浦路东公营工厂与合作社工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为了使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工厂走向企业化，工方向厂方提出四项制度性建议。

（一）克服过去行政与工会的某些不正常的关系，如厂方过“左”的利润观点及行政作风，工方单纯的经济观点和行会思想。明确规定双方关系及正确行使职权，厂方要很好地提出任务，并照顾工人，工方要保证完成任务。（二）要使工厂管理走向合理化，能够真正掌握生产技术，克服部队化、行政机关化的管理作风。消除内外工人的歧视，打破工人与职员的隔阂。一方面要使不懂技术的工厂干部学习业务，同时又要培养技术工人，建立全厂上下统一的职工运动。（三）为了

①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7-38.

②西北局关于贯彻合作社联席会决议的决定[N].解放日报,1944-07-09(1).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63.

使职工的生产情绪提高，职工待遇应提出按劳取酬的薪酬制，逐渐消除津贴制。为了加紧生产，准备反攻工作，时间一般规定为十小时，并正确规定生产任务标准。（四）工厂盈利的分红制应该公队照顾，除照顾厂方的扩大再生产及职工改善生活外，还应将一部分给职工，一部分作为职工的公益金。^①

四、开展社内教育

（一）提高社员觉悟

刘少奇曾指出，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心环“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以提高其觉悟。”^②由于群众对合作社性质认识不充分，加之固有的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导致合作社在经营中普遍存在滥赔问题。滥赔现象不仅妨害了合作社资金的流转，更是让合作社蚀本，反而损害了群众自身的利益。对此，半塔民众合作社做出“忙赔闲不赔”“土赔洋不赔”“尖头社员不赔”“有急事随赔随还”等决议，让群众知悉滥赔的弊端，进而自觉提高思想觉悟。在1943年夏的第三次社员大会上，半塔民众合作社还对社员及非社员中的揩油分子开展了批评，以改造部分群众的个体主义观点。

（二）开展工人思想检讨会

工人思想检讨会是沟通工方与厂方，以及开展工人思想教育的重要途径。1945年，事先经过思想酝酿，天高农具厂厂方开办思想检讨会，会上厂长和指导员首先检讨了领导上的许多缺点，随即又发表了诚恳爱护工人的意见，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经过厂长和指导员的发动，许多工人都检讨了以往的过失，并积极讨论今后如何爱护工厂。此次检讨会，充分改善了厂方与工人关系，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认识，具体体现在：（一）为着工厂的长期发展，工人们自愿减低工资。（二）为表示对厂方的信任与支持，大多数工人都响应号召，与厂方订立长期合同。（三）在过冬棉衣问题上，虽然工人一致拒绝，但厂方为照顾工友的困难，着即组织委员会，给有迫切需要的工人优先配给。（四）确立了从工人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副厂长和副指导员都由工人兼任，其他营业、运输、保管、会计、工务各股，也都有工人同志参加，确保厂内民主。（五）会上工人们踊跃制定个人生产计划，并建立分工合作制度。通过思想和行为检讨，工人们在思想教育方

^①淮南路东解放区工厂企业化[N].解放日报,1945-07-19(2).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61.

面便有很大收获，养成了民主作风，增加了对工会的认同。“现在不但互相成见消除了，而且什么事都不再感到困难，若有什么号召，工人们都积极响应。工友们的脑筋是转变过来了，这就给今后工厂的发展和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①

（三）整顿干部作风

中共中央指出，“不把合作社看作为民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②对于干部贪污腐败的现象，根据地的党组织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检视。对于合作社干部贪腐的根源，淮南区党委书记刘顺元就曾指出：（一）很多干部成分不好，不是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不是民主选举的。（二）民主生活不够，因此从下边来的与同级间的相互监督不够。（三）缺乏必要的制度与严格的检查。因此要改变干部贪腐现象，还需从根本性问题上入手，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与社内的相关规章制度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合作社在内部人事上对消极怠惰、营私舞弊的干部进行了处罚，同时又避免矫枉过正，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治方式规范了许多干部。在社外，根据地政府也为合作社干部制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一）在成分上，要小商人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适当配合，这样对于联系群众、熟悉营业、互相学习等都好。（二）要照顾其本人与家属的生活。外来干部按照一般供给标准待遇，本地干部除自愿领津贴者外，不论有无家属，一律按照能力给工资。思想好的特别奖励，困难的还可以酌量补助。（三）抓紧业务教育及思想教育。规模大、人员多的社，除党的支部及职工会外，在思想教育上应有专人负责。（四）制度之规定应实事求是，执行起来要严格。（五）要在各乡村及互助组内吸收一大批脱离生产之积极分子参加合作社部分工作，合作社运动广泛开展时，要办各种干部训练班，要抽调些德才兼备的干部转入合作社工作。^③

1943年春，根据地又召开了淮南财经会议，对干部进行了反贪污、反剥削思想、反脱离群众作风的教育。在社内社外的双重教育下，合作社干部的作风病得以祛除。到1944年，淮南区党委书记刘顺元更是赞扬合作社“干部工作安心，

^①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厂[N].解放日报,1945-09-27(3).

^②淮南路东解放区工厂代表会向厂方建议工厂企业化[N].解放日报,1945-07-19(2).

^③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1)[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441-442.

积极性高”。^①由上述举措可以看出，根据地政府通过开展教育活动重塑干部价值认同，并通过溯及干部成分来推进合作社干部廉洁化。这种遏制权力滥用的治理逻辑，不仅使合作社回归“为民服务”的本质属性，更形塑了根据地内部的廉洁生态，促进了根据地内部经济建设与组织建设的平衡。

①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5.

第四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曾指出：合作社是“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①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在发展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等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合作社不仅发展了民主的、人民大众的经济，而且深度参与基层管理，把人民大众组织起来，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抗日力量，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一节 改善人民生活

一、平抑物价

1942年4月20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强调，要“发展合作社，调节物价。”^②合作社是商品集散的枢纽，对商品价格涨落的作用明显。合作社平抑物价的目的，是使群众少受市场上的过度剥削。例如半塔民众合作社在开展榨油业务时即规定，“芝麻换油每斗四斤半，实价比市上每斤低两角”^③。在油料价格陡升时，合作社的油价也非立即上涨，以减轻商品投机对群众造成的剥削。合作社在降低物价的同时也会照顾工商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促进私人资本的 normal 发展。为达到群众利益与工商资本间的平衡，合作社对于自己开始销售的某种工业品，常不得不降低市价，而对于自己开始收买的某种农工产品，也常不得不提高市价，待市价已经达到与社会平均利润过分隔离，引起当地物资走私与外地物资之不正常流入，即须把市价稳定起来。^④

在对内贸易中，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的价格比私商的价格略低，社员或抗属购买时减价5%，其他人员购买比市场价低2%。半塔民众合作社在卖货折扣时就遵循了这一标准，在创立之初即设有门市部，社员或劳动互助组员可以凭折照售价赊欠，且结账时享有九五折的优待。对群众来说，农具的价格一般的是市价的八五折，如大锹市价每把1800元，但天高农具厂每把卖1500元，铲头市价每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885.

②刘少奇.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J].真理,1942,(6):23.

③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29.

④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6.

把 950 元，该厂卖 800 元，而配给社员及抗属还照原价打九五折，卖给本厂员工或合作社代销打九二折。以出 317000 元农具计算，则群众所得利益是 475500 元其中社员为买三分之一，则得益 52500 元，工友及合作社代销三分之一，得益 8400 元。共给群众利益 611000 元。^①

在抗日根据地内，合作社对粮价的调控作用尤为明显。由于淮南抗日根据地水旱频发，粮价波动频繁。合作社便采取新谷登场后，抬高粮价，青黄不接时平糶等方式来接济群众并平抑粮价。在 1943 年小麦收获时，天高地区的闵塔、金沟等地小麦价格低，每石只有 120 元（法币）。天高抗日民主政府便及时通知公营商业组织进行收购，并提高小麦收购价格。^②此外，合作社也通过进口来稳定粮价。1941 年，半塔民众合作社从边缘地区购来 290 石粮以压低日益飞涨的市场粮价。^③合作社的积极运作使根据地的粮价稳定，地区间差价缩小，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二、平糶赈贷

1942 年，淮南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的灾荒，合作社在此次灾荒中积极配合政府，缓解了灾情。1942 年，根据地直属一区^[註 1]的合作社“为救济本区旱荒，于八日召开常务理事会，发借法币五万元，并派一人协助计划，以五万元作基金至丰收地区，购买粮食或花生米，而由灾民出力，所得红利均派给所有出力运输之灾民，现正开始筹划。”^④对于灾荒中稻种的缺乏，根据地政府发出指示，“第一，发扬农友们自己互助的精神，贫富相通。第二，农抗借贷所设法补助。第三，合作社帮助买一部分小麦。第四，要求富裕的老板营救。以上为解救我们的麦种问题。”^⑤

半塔民众合作社在根据地的救灾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941 年秋种时，半塔民众合作社贷给社员 90 石麦种。1943 年春季救灾中合作社又发出社

①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厂[N].解放日报,1945-09-27(3).

②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136.

③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滁州地方史(第 1 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252.

④直一区农抗召开麦种贷款会议[N]新路东报,第 175 期,1942-09(1).

⑤直一区的救灾活动[N].新路东报,第 175 期,1942-09(1).

注 1: 即直属一区, 指来安县半塔镇。

员贷款 5 万元、小商贷款 3 万元，赈豆饼 7000 张（合市价 17 万元），贷稻种 20 多石。1943 年夏，合作社贷给 118 户穷苦社员 65 条耕牛。^①

半塔民众合作社在难民的救济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 年秋后，山东移民纷纷南下淮南地区，适值天旱，不仅 250 余户新来移民没有口粮，即老户亦近 200 家缺乏冬粮。在此困难关头，半塔民众合作社又发放了 1100 片豆饼。在春荒的时候，半塔民众合作社并举办了纺织救济，发出 700 多辆纺车，贷出棉花，移民每纺一斤纱可得工资 52 元。经过这样多方面的努力，移民遂安然度过灾荒。之后政府组织移民生产，群众团体先后动员了 49 条耕牛帮助移民开荒，半塔民众合作社贷出 17300 元，购买了 70 多件农具。”^②经过合作社的救助，山东难民得以在根据地安家落户。

1944 年是半塔民众合作社参与赈贷最频繁的一年，在一年间累计发出赈贷款及物资合计 665000 元，对根据地的社会救济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据津浦路东根据地的机关报《新路东》记载：

“一、今年古历三月间，发出救灾贷款九万元，午收后归还，不加分文利息。二、古历四月初，发出赈灾豆饼七千片，折合市价十七万五千元。三、古历四月中旬预付买小麦洋四十万元，其中具体办法是：凡青黄不接之人民（大半是中农及小地主）预约在午收后卖小麦给合作社者，得从合作社预支洋二百五十元，午收后小麦普遍登场时（规定为古历五月十八日）之市价作价，比如当时市价是五百元，即作价五百元，除预支二百五十元，再找补二百五十元，此种预卖小麦的人民，如是社员者，除市价外，再多付卅元（其中十元是新股票），如是非社员，除市价外，再多付十元（视其自愿，或给钱，或给股票）此项预卖以三担为限，豌豆等类推。汉涧有放麦青者，低至二百元一担，如此合作社则不啻以廿万元以上之利益给予民众也。四、最近半塔市上食粮极恐慌，合作社趁机实行平糶，计已糶出小麦八十担，每担比市价低一百元；大芦秫一百廿担，每担比市价低百廿元。尚在继续平糶，一直到小麦上市为止；这样做的结果，把粮价压低了不少，比如小麦曾涨到一千零五十元一担，现已跌至七百元上下矣。五、发出纺车七百多辆，有一时期日发工资八九千元，再加木匠、弹工、铁匠、运输等工资，也有上百万的数目。”^②

半塔合作社的社会救济超越了一般营利目的，真正将群众路线作为自身发展

①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滁州地方史(第 1 卷)1921-1949[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252.

②半塔民众合作社努力救灾,响亮回答党与政府号召[N].新路东报,1943-05-27(1).

信条。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对此评价道,“在今春荒救灾中,人民对合作社的好处,已认识得格外清楚。半塔合作社已成为该区人民经济生活上的一支雄厚力量,半塔区及其附近各区之民众合作社事业,必然获得十百倍的发展。”^①

第二节 推动经济发展

一、充裕物资

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常年封锁边区,禁止药品、布匹、食盐等军需日用品向根据地输送,妄图困死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在此情况下,根据地政府建立和发展合作社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打破此种经济绞杀,以支持长久抗战。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大力推广合作社,把群众分散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形成规模化生产,有效地削减了外部的经济制约。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根据地内的合作社主要面向手工业等实业领域,发展生产以充裕物资。1944年,由于半塔民众合作社的纺织、卷烟等手工副业经营得当,全年计织布13831斤(外毛巾6112条,代群众织布1100斤),卷烟224925包(仅年底产量),纺纱5660斤(外发动群众纺纱10850斤),支援了根据地的商品供给。^②淮南铜城的天高农具厂,在1944年7月到11月间,总计出售农具3172460元,除原料成本外得毛利1204590元,再除去开支816541元(工资、伙食、员工衣服、职员津贴及办公费)余388025元。此外得自强公司红利12万元,皮革8500元,存储生铁8300多斤,熟铁6000多斤,四个月共净赚516553元。^③

合作社生产的物资也支援了军需。半塔民众合作社的纺织厂曾为驻大刘营的新四军二师部队做军衣五百套、军鞋八百双。^④1942年,半塔民众合作社还将全社出产的10万多米土布中大部分染成灰色,支援部队。^⑤半塔民众合作社还凭借商业属性支援根据地的新四军队伍。1942年,合作社曾受新四军二师供给部委托,由杨文才等人携带十几万元“中储券”到扬州一带,以汉润商人身份采购了

①半塔合作社努力救灾,响亮回答党与政府号召[N].新路东报,1943-05-27(1)。

②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35.

③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厂[N].解放日报,1945-09-27(3).

④安徽省滁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皖东文史(第1辑)[M].皖东文史编委会,1996:219.

⑤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滁州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745.

大批棉布，后用八匹骡子驮回给部队做军装，支援了路东的新四军建设。^①铜城的天高农具厂除给群众打工具，还替新四军二师军工部打了九百斤成品，市价每斤为 260 元，给军工部以 160 元计算，使部队节省经费 72000 余元。^②

二、统制商品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两类交换，一类是与根据地群众的交换，一类则是与根据地外的交换。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积极鼓励商人通过自己的进货渠道和关系，购进根据地需要的商品，输出根据地出口的物资。而根据地的合作社就在辅助根据地边检贸易站，联络小商人、促进根据地农副产品流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 年，淮南抗日根据地贸易局与来安六合货物检查处合并，改名为来六货管局，兼管财政、税收、货币、贸易等，并提倡以公营商业为中心组织合作社商业。合作社通过在多个乡成立代销处，来将货品的流通范围覆盖至乡村和各互助组。各乡的代销处均由脱离生产的干部主持，所售货品都是群众必需的，如手巾、肥皂、食盐、油、火柴、大包烟、火纸等，其价格与集市所售价相同，但结账时不像普通商店要升价，便利了群众，促进了乡村经济的流通。这种机制使群众生活成本大幅降低，同时通过“以物易物”回收了大量农副产品，有效平抑了工农业产品剪刀差。

在应对外部经济渗透方面，合作社展现出充分的灵活性。既利用商人跨区采购网络输入药品等紧缺物资，又借助合作社信用体系防止走私套利。如商人从敌占区采购的棉纱、火碱等，须经合作社代销处验核登记后方可进入流通，此举使战略物资流失率大大下降。^③这种“疏堵结合”的统制策略，使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进口商品的定价权，节制了外来商品的肆意流入。

随着合作社参与商品流通的程度不断加深，根据地政府对合作社统制商品的作用也愈发重视。1944 年 6 月，华中局出台了《关于贸易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划了合作社在根据地贸易系统中的地位，要求：“A、各县尽可能筹设公营商

①章书范.淮南抗日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65.

②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厂[N].解放日报,1945-09-27(3).

③安徽,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95.

店，以调节物价。B、通过合作社直接帮助基本群众出售农产品，换回其所需要的工业品，以减少其剪刀损失。C、尽量扶助合作社，建立基层贸易网。”^①

三、 辅助金融

根据地的金融受到敌伪的骚扰，“敌伪禁止我法币在三省（苏浙皖）两市（京沪）流通并强定伪中储银行纸币为唯一通货，法币购买力受敌伪此次破坏，急遽低落，以至物价飞涨，市场紊乱，苦不急谋对策，则法币大量流入边区，而我之物资被敌伪攫取，社会民生蒙害甚巨。”^②为打赢经济战，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特成立淮南银行，发行淮南币。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在辅助淮南币的流通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部分合作社在根据地政府的授权下充当了临时货币发行单位。1942年，半塔民众合作社积极响应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发展手工纺织，但根据地中心区遭受灾荒，合作社措股难，资金不足，遂向淮南银行申请贷款。淮南银行印制科当时抗币印制供不应求，同时市面上又缺少辅币，便决定由半塔民众合作社代为印制发行，充作生产贷款。合作社先后印制发行了58万元小额兑换券，面值主要为“壹角”和“贰角”，该类辅币式样精致：

“壹角券为茶绿色，票面正中上方自右往左印有‘直一区民众合作社兑换券’字样，正面图案为一两层翘角的亭子和小树，右面花框内有空心‘壹角’二字，并加盖红色篆书印章一方，下面加盖有‘整拾角兑淮南边币壹元’行红色小字。票背面上下印有‘完粮纳税’‘一律通用’两行字，右上方加盖了红字码。”^③

辅币的发行大大缓解了货币流通不足的困境，繁荣了市面。1943年，淮南银行为方便市面找零起见，又批准半塔民众合作社印制三万元五角兑换券，该兑换券“比率与边币同，该券正面黄色底纹，红色花纹，背面粉红色底纹，蓝色花纹，黑色号码，红色圆章，新券样本，业经呈请路东专员公署备案，准予发行，并布告周知。”^④

①安徽,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95.

②行署发出布告,淮南银行正式成立,定改行钞票为边区本位币暂发行五元券供各地流通[N].新路东报,第154期,1942-07(1).

③章书范.淮南抗日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57.

④淮南银行发行一元券,并批准半塔民众合作社发行五角兑换券三万元[N].新路东报,1943-02-28(2).

日寇投降后，合作社仍然活跃在根据地的经济战线上。1945年，中储券大幅贬值，导致华中解放区群众利益受损，发行新币稳定根据地金融成为迫切之需要。同年，华中银行成立，着即发行华中币，华中财政委员会指示各地，“除华中银行已在各地以华中币无限制等价兑换各地方币外，本会已决定各地税收机关、贸易机关、合作社、盐务管理局，都须等价收用，并兼理兑换，以便早日贯彻等价流通。”^①合作社作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在促进华中币流通的前线，为根据地的经济解放作出贡献。

第三节 助推基层社会秩序调整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通过经济纽带重构了传统乡村权力结构。在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本土化实践中，合作社不仅实现了“群众动员的结果”与“动员群众的方式”的辩证统一，^②更以民主化的方式瓦解了乡村经济中的封建依附关系。半塔民众合作社的乡代销处成立后，合作社已渗透到乡村中去，并和互助组结合起来。“合作社的社员，一般都参加了互助组，民众买东西时只需选派代表（合作社代表）作为买办人，有钱无钱都可以把需要的东西买回来，平时一个互助组只需一个人即可，不浪费人力，收账时组内集体动员还账，一时付不起时可延到下月还清。合作社的牛也借给互助组，帮助互助组解决困难。”^③合作社与互助组的结合既为群众带来了切实的便利，又构建了基层信用共同体。

在具体运作中，这种结合展现出独特的政治整合功能。面对1945年路东地区农具短缺危机，半塔民众合作社创造性实施分级供给方案：总社统筹物资调拨，乡分社按需配给，互助组建立动态需求登记制度。这种模式使农具供给效率大幅提升，解决了大量贫民与移民无力购置生产工具的困境。^④更具治理创新性的是，合作社的代销处延伸了政府的工作能力。政府的例行公事如打路条^[注1]等，都可由合作社代销处的负责人代办，使党的干部不必终日枯坐室内，便于深入群众开

①江苏省财政厅等.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4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37.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1072.

③津浦路东劳动互助的经验[N].解放日报,1944-05-25(2).

④半塔区集合互助组长开会,交换经验研究办法[N].淮南日报,1944-04-17(1).

注1:“路条”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根据地游击区交通往来的通行证,为出差执行公务人员通过哨卡之用,用过收回。

展工作。^①

合作社的基层治理效能更体现在社会动员层面。作为淮南抗日根据地商品、人员、钱粮的重要集散地，合作社在政府政策的推广上起到了良好的辐射作用。1943年，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号召“土纺土织”运动，在半塔民众合作社的积极响应下，该运动的效果与规模急剧放大。1944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半塔民众合作社支持半塔区妇抗会召开全区各级妇抗干部会议，讨论通过了各乡建立纺织合作社，动员和组织全区广大妇抗会员开展纺织竞赛的决议，带动全区妇女参与土纺土织事业。

第四节 为解放后合作组织的重建提供经验

随着硝烟散尽，淮南地区经济逐渐回暖，合作组织也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1948年冬，江北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骆滕云带领原互助组成员随军南下。1949年1月，骆滕云按照此前组织互助组的经验，组织起解放后安徽省第一个农业互助组。1951年，骆滕云又创办了滁县地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余郢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冬，又带头将初级社转为高级社。1958年，大余郢农业社与周围几个农业社合并成立大余郢人民公社，骆滕云担任人民公社主任。

民众合作社所遗留的经验也为解放后供销社的建立提供了遵循。解放战争后，来安县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大为稳定，但该地区仍面临物价动荡，农村高利贷猖獗人民群众吃盐难等问题。针对上述情况，“1949年，县人民政府以半塔区做试点，按照民众合作社的模式，成立了半塔供销社，扶植农民发展生产。”^②新成立的供销社沿用了半塔民众合作社的模式与经验，及至1951年，半塔供销社“在来城、施官、相官、汉河雷官建立基层社，1952年底普及到全县大小集镇。”^③半塔供销社在来安县的局面全面展开。

半塔供销社成立后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在保障供给、稳定物价、平衡物价、刺激流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半塔供销社延续了半塔民众合作社平抑物价，为群众造福的理念。“1953年春荒严重，合作社在夏收前预购了群众

^①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实行织布组分红产量大增[N].解放日报,1944-07-03(2).

^②严希,安徽省来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来安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205.

^③求是杂志社经济部,欧远方.安徽·来安[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19.

的 170 万公斤麦子，并贷放无息口粮 61.5 万公斤，有力地打击了企图压价买麦青的投机商贩和高利贷者。”^①同时，半塔供销社也沿用了合作社的民主路线，供销社“每年召开一次社员代表大会，由理事会作工作报告，征求和听取代表意见。社员代表选举产生理事会，并管理合作社。”^①

1956 年来安全县有 97% 的群众入股了合作社，同年半塔供销社商业网点开始下沉，开辟农村市场。及至 1985 年，“县供销联合辖农业生产资料、产棉麻、废旧物资回收。信托、日用杂品和工业品等 7 个公司、26 个基层社和 11 个分销社……供销商业人员占全县商业人员总数 17%，当年销售总额 5186.5 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43.5%。”^②半塔供销社重现了半塔民众合作社蓬勃发展的局面。

①求是杂志社经济部,欧远方.安徽·来安[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21.

②严希,安徽省来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来安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205.

第五章 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发展的当代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在经济战线和基层工作上都发挥了瞩目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合作社以实事求是精神为根基，以典型示范为路径，以综合发展为目标，不仅有力支援了抗战事业，更为中国基层治理与农村合作经济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回望这段历史，其蕴含的红色基因与科学方法论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第一节 坚持党对合作社工作的领导

党员干部是合作社发展的中坚力量。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创立往往采用民办官助的形式，但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无论是合作社自发创建还是被动组建，都无法脱离党员干部的参与，都离不开党的切实领导。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环境纷繁复杂，合作社要减小经营过程中的盲动性就需要经济领域的人才储备，但根据地群众的受教育层次并不支持这样的条件。在此情况下，党员干部就成为合作社经济工作中的中流砥柱。中央对于经济领域的党员干部的培养亦格外重视，提议各地必须开办财政经济训练班，在附近地区可选送一批人来延安财政学院学习。^①毛泽东更是指出，“经济管理人才对合作社来说至关重要，是合作社发展与壮大的保证，合作社可以自己培养或者发现人才。”^②在党的政策加持下，各根据地合作社汇聚了一批懂经济的党员人才，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合作社的经营风险。在淮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政府也对合作社经济干部的培养，发掘出杨言德、董弼等一批既熟知合作社经营，又了解经济理论的专业型人才，新中国成立后杨言德等人在经济战线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合作社作为根据地的经济单元，难以脱离党的政策支持与组织基础而独立存在。传统的互助合作更易发生在经济基础、社会地位相近的群体中。对于中国乡土社会而言，互助合作往往以血缘亲疏为维系基础，偏向于家族内部的合作，封建式的血缘壁垒限制了乡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展乡村工作后，着手

^①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61.

^②毛主席谈合作社业务发展边区经济文化[N].解放日报,1944-07-04(1).

扫除封建残余，广大互助组和合作社才有了建立的基础。除此之外，如果没有党的政策引导，合作社的发展多因陷入旧的斗争经验而停滞。淮南根据地的合作社在入股上开始时只限工农群众入股，这就背离了根据地的经济现实和统一战线的要求，而后在根据地政策的引导下才变更了入股条件，合作社才得以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合作社的组织功能也决定了它绝不能脱离党的领导而存在。

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与基层党支部形成功能互补。淮南抗日根据地内合作社的大量兴起，在侧面上降低了党的组织成本，譬如半塔民众合作社通过沟通根据地政府与互助组，在重建乡村经济秩序的同时，也将党和根据地政府的政策层层传递，数倍放大，让更多群众迈进新民主主义的秩序轨道。进入新时代，农村经济结构向着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向前进，合作社的功能特点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向更为吻合，发展前景更为广阔。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农业强国的历史任务，党和政府对农村的经济投入和制度投入与日俱增，迫切需要多元化、专业化的对接窗口。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虽是政策的承接载体和宣传主体，但面对规模庞大、情况多样的农民群体，工作开展的效果难免有所折扣。合作社作为党在农村工作中政策和财政转移的焦点，自然被赋予宣传阵地和组织阵地的功能，加之其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直接联系，对群众的影响更为直接。因此，新时代发展农村经济，不仅要考虑合作社的经济功能，更要发挥其组织功能，合理地利用合作社在基层组织工作中的特殊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工人阶级国家，为了农民的利益，必须拿出一定的资金帮助合作社，这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是白费金钱，然而这是善于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①由此可见，在农村基层工作中扶持合作社的发展，能够进一步将国家对农村的转移支付转化为组织优势。

基层合作社的办社问题和监管问题也需要党组织开出“良方”。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在发展。在当今时代，行政推动下的合作社，虽然在规模上发展较快，但社员思想与发展速度大为脱节，仍然是“等靠要”思想。这就造成了大量合作社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甚至退化为“空壳社”，虚耗国家资产与农村资源。此外，由于农村发展的资金缺口与农民收入的结构矛盾，农民对助农贷款的需求逐年上涨，直接导致信用合作社在农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合作社的金融属性急剧膨胀，

①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2.

若缺乏有效的管控,势必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产生巨大影响。但与之相对的是,当今基层合作社在监察体制上仍存有一定的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虽让合作社监事人员的设立有法可依,“但监事人员的具体职责与权利在本法中未能有足够的体现,其任职在实际中也多为合作社理事长所指任,不能成为有效的强制性的第三方。”^①基层合作社监察体制的不足更加呼唤有效的管制措施。有鉴于半塔民众合作社党员参与的历史经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模式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监察制度的缺漏,对于党组织更深层次地融入基层工作事务,巩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地位等也有一定助益。上述现象的出现,要求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合作社成立时更为审慎,在审查合作社资质时更为严格。

第二节 以“典型示范”增强农民办社的内驱动力

“典型示范”在党的政策体系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被实践所证实的适宜农村的推广方式。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模范合作社的选树,广大根据地群众真切地感受到合作社的积极作用,增强了民众办社的内驱动力。根据地政府通过推广模范合作社的经验,让其他后起之社有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板,也降低了后续经营中的试错成本。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半塔民众合作社的发展让周围县区合作社的发展数量和经营质量都有所提高,发挥了模范社的旗帜作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形式,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②在新时期发展合作社事业要进一步发挥“典型示范”的作用,形成地方政府为引导,模范社为引领的合作社发展格局。

地方政府应发挥引导作用,形成激励机制。以淮南抗日根据地为例,民主政府通过颁布《合作社组织大纲》构建制度框架,实施税费优惠与模范表彰等组合政策,有效激发了合作经济发展活力。新时代地方政府可沿袭“制度供给-价值引导”的模式:其一,在制度层面精准施策,结合区域特色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通过要素集聚效应培育规模经济,同步建立动态监管机制规范发展路径;其二,

① 缪德刚,张延龙.中国农业合作组织构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J].农村经济,2024,(03):112-122.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57.

在价值引导方面实施分层推进策略,既要运用融媒体平台开展政策解读,消除群众认知误区,又要构建示范培育体系,建立科学评估指标,实施动态考核机制,重点培育省市级示范社,通过可视化案例展现合作经济增收实效,形成“培育一个、带动一片”的示范效应,激励广大群众的办社热情。

模范社应发挥引领作用,带动区域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方向,要支持有条件的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农民合作社、合作社根据发展需要办企业”。^①在与企业的关系上,半塔民众合作社在发展期间,创办了织布厂、卷烟厂、农具加工厂等工厂企业,稳固了在根据地的发展基础。新时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更好地融入市场,也可结合自身实际创办企业,借此协调内部结构并将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以经营结构的多元化增强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以业务范围的扩大化提高对市场风向的嗅探能力。在与区域内农户的关系上,半塔民众合作社以其纺织业务的需求,带动了区域间小农户的整合,形成了规模化的植棉产业。当今合作社在发展中也可结合地区产业,带动区域间农户的产业联合,助力家庭农场等更具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并进一步结合农户意愿进行吸纳或整合,弥补其嵌入市场较浅的劣势,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第三节 重视综合发展的办社方向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合作社运动列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之一。但彼时,党对于开办合作社的经验尚不深入,大部分合作社以专营一种业务为主。抗日战争时期,合作社数量快速膨胀,多业务兼营的合作社开始大量出现。1937年,南区合作社增设信用部,开始走上综合办社的发展道路。1939年5月,晋察冀边区合作社组织纲领规定,合作社“可以斟酌资力人力及实际需要,分营一种一目,或者兼营数种数类,听其自由选择不加限制。”^②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半塔民众合作社以手工业生产合作为基础,逐步将职能扩展到消费、信用领域,成长为淮南地区综合型合作社的标杆。综合型合作社的出现适应了根据地的需要,是党领导合作社实践的重要成果。抗日根据地时期综合社大量出现因素,可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综合办社可让内部业

①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4-17.

②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789.

务之间相互调剂。譬如合作社放贷金额多受限制，就从合作社消费业务的盈余中抽调一部分补发农贷；其二，综合办社有利于降低合作社的营业成本。其三，综合办社有助于减少农民在流通中所受的剥削。抗日战争时期，农民要受工业品的剥削，农产品要受商人勒抑，而以流通为主的综合型合作社的出现大大缓解了这一形势。综合型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于改善根据地内的经济结构无疑是一味良药，对于当今合作社的发展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合作社再次适应我国农村经济环境发生新的变化。集体经济下的农村供销社接替抗战时期合作社的部分职能，统筹了农村的流通领域，并在根植我国农村的发展进程中，对农民观念及农村发展格局产生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生产领域发挥了提质增效的作用，而在流通领域，还缺乏和下游的有效联系，仍然需要供销社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专门谈及供销合作社工作，赋予了供销合作社极大的期望。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通过供销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的经营组织形式和农业社会化服务，再加上政策引导，把一家一户的生产纳入标准化轨道。”^①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供销社的协同作用，适应了新形势下我国农村发展的需要，拓宽了农民增产增收的渠道。但当前形势下，我国农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农村合作社的资金缺口较大，需要相关的金融服务予以支撑。在此形势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形成农民专业合作社供给产品、供销社居间服务、农村信用合作社资金支持的发展格局。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构建的综合平台外，农村合作社自身也要向综合办社的道路上发展，建设“三位一体”的时代新社。“三位一体”合作社是指从单一农业生产服务，发展到生产、供销、信用综合业务合作，打通各业务间的隔阂，实现更大的经济效益和市场规模。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举措。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已经从浙江推广到贵州、重庆等省（市），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实践证明，“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社，是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大创新，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路

①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22:787.

径。综合型合作平台和“三位一体”合作社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服务内容的叠加，而是组织要素的融合与主体功能的创新，是对抗日战争时期半塔民众合作社等“综合型”合作社的发展与优化，有着符合当前农村发展趋势的新内涵。其中，流通合作是主导、生产合作是基础、信用合作是支撑，三者有机互补、协同运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把深化综合型合作平台和“三位一体”合作社作为重中之重，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动农村新型合作事业走向深处。

第四节 坚持实事求是的办社原则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在各个时期开展工作的重要遵循。抗日战争时期，封建式的小农生产关系承载的生产力十分有限，天灾、兵祸、匪乱让农民的生产条件更为恶劣，加之小农脆弱的生产方式，农民破产，农业破坏已成常态。因此，中央要求在开展合作社运动时，“要调查各地区的经济特产状况，商业的繁荣与落后，物品的消费种类，生产的多少，以及各地土产品的统计。调查之后，按各地区所适合的需求决定是否新办合作社，办什么样的合作社，规模大小如何。”^①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实践中，根据地政府立足生产实际，将互助合作运动根植于传统小农经济土壤。政府实事求是地帮助农民制定生产计划，既尊重个体生产惯性，又渐进培育集体协作意识，为生产关系转型奠定基础。这种实事求是精神不仅体现在宏观政策层面，更渗透于合作社微观运营。面对落后的生产基础，根据地的合作社创造性地选择副业路径，以手工业等短周期项目快速改善民生，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范式。

新时代发展合作社应实事求是地着眼于完善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户生产自主性、积极性大幅提高。进入新时代后，科学技术的实物化成果大量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农业生产条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的本质属性没有变，生产周期长、回报率低的经营现状没有变。农业生产环境与农民收益期望间的沟壑现实存在，成为农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统计显示，2023年乡村常住人口占比降至33.8%，^②流出人口中青壮年比例居高不下，折射出农业生产预期收益与现代化生

^①中国供销合作总社史料丛书编辑室.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二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431.

^②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活成本的深层失衡，而破解困局需重构产业价值链条。淮南抗日根据地合作社的发展经验证明，发展周期短、收益弹性大的特色副业，既能实现农副产品增值，又可构建“主业保基本、副业促增收”的复合型经济结构。宜业方能宜居，以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副业的发展，为人口回流创造了经济引力，让劳动人口有留在农村的现实基础，为改善农村人群“三八、九九、六一”的人口结构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基层合作社在建立过程中需避免“盲目泛滥”的现实问题。在微观层面，农户自发形成的生产协作（如农机共享、统购统销）已能满足基本需求，规范化的合作社建制反而产生制度成本；宏观层面，部分基层存在运动式建社倾向，将合作社异化为“万能药方”。对于以上问题，合作社的组织应以乡村承载能力和农民实际需要为基准，追求适度规模化发展。对于基层党支部建社实践而言，既需要基层党支部继续响应宏观政策，“自上而下”地推动农村合作社广泛成立，又需要重视引导农民发挥主体作用，“自下而上”地自发组织合作社，并参与到联合社的组建过程中。这种上下联动的组织创新，既能避免“揠苗助长”，又可突破单个合作社的发展瓶颈，最终形成适应现代农业农村的新型合作生态。

新时代合作社被赋予了新内涵，但仍然不能脱离农村的现实土壤，合作社在农村环境中生根发芽绝非旦夕之功，唯有根植实践、久久为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才能稳步前进。

结 语

1943年,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对合作社如此评价:“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①在抗日战争的历史环境下,合作社不仅是经济领域的生产自救组织,更是政治动员的基层载体,是社会重构的重要纽带。1938年,新四军深入淮南地区进行根据地的开辟工作,此时的淮南抗日根据地就如同一叶孤舟,虽然深深楔入敌人腹地,但也面临敌伪的频繁袭扰,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加剧了根据地内部民贫财尽的境地。

在党中央“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战略指引下,淮南抗日根据地政府通过减租减息、政策引导、树立典型等举措,逐步发展出覆盖农业、手工业生产、运输、信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系统,为根据地内分散的生产要素找到了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根据地领导人也以“嚼残江左三冬雪,染出淮南一代红”的精神,深耕革命根据地建设,培养出一批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优秀干部,为根据地合作社迈入更高层次打下了坚实基础。合作社的发展也提振了地区经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内部的商品流转也逐渐并入根据地间的经济循环,抗战的经济力量终得汇成一片。

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合作社不仅是经济自救的工具,更是精神觉醒的载体。当施营王氏族人变卖祖产投身合作生产,当骆滕云互助组辗转千里坚持“行军生产”,其背后所承载的不仅是生存意志的迸发,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价值觉醒。这种将个人命运融入民族解放洪流的历史自觉,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社区别于传统经济组织的本质特征。回顾那段革命征程,合作社不仅是群众结合自身生活经验的曲折创造,更是党带领人民谋求经济独立的上下求索。这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共同书写的革命历史,正是当今合作社发展的深刻借鉴。

硝烟已逝,烽火长存。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但闻江淮大地麦浪翻涌,神州共响。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31.

参考文献

一、外文译著

- [1]马克思.法兰西内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0](瑞典)达格芬·嘉图;杨建立等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1](美)弗里曼等;陶鹤山译.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12](美)马克·赛尔登;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13](美)施坚雅;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二、中文著作

- [1]安徽,河南,浙江,江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苏浙皖鄂豫抗日民主政府的工商

- 行政管理[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7.
- [2]安徽省滁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皖东文史(第1辑)[M].皖东文史编委会,1996.
- [3]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 [4]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5]程必定.安徽近代经济史[M].合肥:黄山书社,1989.
- [6]方兆本.安徽文史资料全书滁州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M],2005.
- [7]龚意农,安徽省财政厅.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 [8]高国平,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 [9]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淮南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10]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2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 [11]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选编(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
- [12]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张云逸军事文选[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 [13]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M].邢台:冀南书店,1946.
- [1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求是杂志社经济部,欧远方.安徽·来安[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 [1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农业)[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18]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工商合作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
- [19]许毅.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20]严希,安徽省来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来安县志[M].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 [21]章书范.淮南抗日根据地货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 [22]张太雷.张太雷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3]周万钧.合作经济概论[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 [2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5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26]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淮南抗日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
-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2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3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3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博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博兴文史资料(第8辑)[M],1997.
- [32]中共滁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滁州地方史(第1卷)1921-1949[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 [33]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2022.
- [34]中国供销合作总社史料丛书编辑室.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第二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 [35]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36]赵凌云.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三、中文论文

- [1]房列曙.江靖宇与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以来(安)六(合)地区为中心[J].军事历史研究,2018,32(05):1-17.
- [2]苑朋欣.在曲折中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合作社[J].农业考古,2023,(06):152-160.

- [3]何伟福.抗日根据地合作社述论[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8):17752-17756.
- [4]贺文乐.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03):96-102.
- [5]贺金林.抗日根据地的变工互助运动[J].党的文献,2018,(02):91-98
- [6]蒋淑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迪——基于经典文本的考量[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1,(03):12-24.
- [7]刘顺元.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J].淮南党刊,1944,(17):28-40.
- [8]缪德刚,张延龙.中国农业合作组织构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J].农村经济,2024,(03):112-122.
- [9]钱孟邻.信用合作社为什么不信用[J].中国农村 1940,(11):09.
- [10]任大鹏,赵鑫.马恩的合作社思想与当代合作社价值反思[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6(04):13-20.
- [11]宋利.抗战时期中共乡村动员机制研究[D].内蒙古大学,2023.
- [12]师政治部机关生产节约公私兼顾的实施计划[J].淮南党刊,1944,(16):57.
- [13]文侃.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的典范——论中共安源支部的历史地位与贡献[J].苏区研究,2022,(05):18-33.
- [14]吴云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研究[J].中国农史,2021,40(01):132-145.
- [15]吴路伟.农民动员机制构建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治理[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4,(01):64-76+141-142
- [16]习近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求是,2023,6:4-17.
- [17]张玫,郑金彪.淮南抗日根据地党风廉政建设研究[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4(04):68-77.
- [18]赵道旭,冯翠.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建设及其成效[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4(03):31-38.
- [19]俞小和.调整与变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J].安徽史学,2013,(04):110-117.
- [20]张宏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建设研究[D].山西大学,2019.
- [21]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市中心支行课题组,黄晖,杨晖.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的实践及启示[J].银行家,2023,(10):124-126.
- [22]张锡昌.抗战三年来的合作事业[J].中国农村 1940,(10):04.

- [23]刘少奇.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J].真理,1942,(6):23.

四、报纸文献

- [1]半塔民众合作社努力救灾,响亮回答党与政府号召[N].新路东报,1943-05-27(1).
- [2]半塔区集合互助组长开会,交换经验研究办法[N].淮南日报,1944-04-17(1).
- [3]春耕运动中应做的几件事[N].新路东报,1943-03-04(2).
- [4]海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概况[N].解放日报,1941-11-05(3).
- [5]淮南路东解放区工厂企业化[N].解放日报,1945-07-19(2)
- [6]淮南路东解放区工厂代表会向厂方建议工厂企业化[N].解放日报,1945-07-19(2).
- [7]淮南实行劳动互助解决水利难题[N].解放日报,1944-03-27(1).
- [8]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为群众谋利八百万元[N].解放日报,1944-11-10(2).
- [9]淮南来安泉水乡开展劳动竞赛[N].解放日报,1944-04-19(1).
- [10]淮南银行发行一元券,并批准半塔民众合作社发行五角兑换券三万元[N].新路东报,1943-02-28(2).
- [11]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实行织布组分红产量大增[N].解放日报,1944-07-03(2).
- [12]淮南苏皖边区行署第四次委员会会议[N].新路东报,1944-01-14(2).
- [13]津浦路东劳动互助的经验[N].解放日报,1944-05-25(2).
- [14]来安施营王姓捐献祖产救国[N].新路东报,第 175 期,1942-09(1).
- [15]莲塘合作社扩展营业,群众纷纷自愿入股[N].淮南日报,1944-04-11(1).
- [16]路东公营工厂及合作社工厂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摘要[N].淮南日报,1945-06-10(1).
- [17]毛主席谈合作社业务发展边区经济文化[N].解放日报,1944-07-04(1).
- [18]秦佐.淮南半塔民众合作社[N].解放日报,1944-03-10(2).
- [19]秋谷.淮南天高农具工厂[N].解放日报,1945-09-26(3).
- [20]盱嘉民众纺织厂概况[N].解放日报,1944-04-30(3).
- [21]行署发出布告,淮南银行正式成立,定改行钞票为边区本位币暂发行五元券供各地流通[N].新路东报,第 154 期,1942-07(1).
- [22]西北局关于贯彻合作社联席会决议的决定[N].解放日报,1944-07-09(1).
- [23]直一区农抗召开麦种贷款会议[N].新路东报,第 175 期,1942-09(1).
- [24]直一区的救灾活动[N].新路东报,第 175 期,1942-09(1).

致 谢

不知不觉间我在安徽工程大学已经度过了三年，三年里我得到了老师们的教诲，同门的鼓励，以及同学言之不尽的帮助。感谢你们，让我的学习生涯充实完整。每当读到别人论文后记时我都会想象，等到我提笔撰写时会是何种景象。与想象中的激动不同，此时我脑海中涌出的是诸多感激之情。

感谢我的导师李海涛老师，承蒙老师不弃将学生收至门下。授业之恩天高水长。在本论文撰写的过程中，老师不辞辛苦，百般提点，上至行文结构，下至标点符号，都帮我将其中错误一一指明，在老师身上我见识到了一个学者真正该有的治学态度。在生活中老师也如春风化雨，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同门师姐、师弟、师妹们都是关怀备至，感谢老师让我感受到了师门的温情。

在此我也要向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卫华老师、吴月红老师、刘德军老师、方前移老师、虞满华老师、毛加兴老师、孙前梅老师、凌取智老师、尚子翔老师、余文华老师等诸位老师表示谢意，老师们的课程为我打开了研究生学习生活的大门，启发了我的思考。黄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吴云峰老师，为我的毕业论文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料，在此也致上真挚的谢意。此外，裴利萍老师对我辈同学关怀备至。李德才老师热情开朗，为同学们日常操劳。韩家勤老师和王明老师为我们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谢谢各位老师。

感谢诸位同学，虽不能一一致谢，但仍希望你们今后都能所行无碍。感谢我的师姐张娜，谢谢师姐不胜其烦的指点，让我对自己今后的方向有了一定的规划。感谢我的同门徐筱、刘洋、杨杰、赵薇，祝愿你们都能前程似锦。感谢郭盛同学，陪我一起学习，让我在千里异域有了家乡之感。

感谢我的父母，感谢父母的支持与理解，让我在千里之外无后顾之忧。感谢父母日常辛苦操劳，让我的求学之路化为坦途。你们是我生命中最坚强的后盾，希望我也能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腹中千言，落笔寥寥。浮萍尚有相逢日，希望能与各位师友再会。